

创刊号(2008): 顶尖大学与高等教育全球化

国际高等教育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Launching Issue, 2008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趋势的日益加剧和中国高等教育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与国外高等教育交流的需求与日俱增。《国际高等教育》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并将努力发挥中国与国外高等教育交流的桥梁作用。本刊由两部分组成: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编辑出版的“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的中文版,每年4期;由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围绕中国与国外高等教育热点问题编辑出版的专辑,每期一个主题,每年最多出6期。

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编辑的“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每期包含十余篇有关国际高等教育现状和发展趋势的文章以及新书简介。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编辑的专辑则包含世界一流大学、大学评价与排名、研究生教育、科学英才迁移等热点问题的国内外研究论文、研究报告、综述文章、书评以及有关的会议和活动信息。

本期是《国际高等教育》的创刊号,包含了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近几年来编辑出版的“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中有关世界一流大学、研究型大学、高等教育全球化等方面的文章30余篇。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Guoji Gaodeng Jiaoyu) is an online journal with an aim of playing the role of bridge between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communities. It consists of 4 issues each year translated from the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published by the Boston Colleg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in USA and up to 6 issues each year focusing on selected topics of both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interests, such as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university ranking, graduate education, and migration of academic talents.

Each issue translated from the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by Boston College contains more than a dozen of short articles covering major aspects and trends of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and new publications. Each issue focusing on selected topics of higher education contains original studies, preliminary reports, review papers, letter to the editor, book reviews, and up-to-date information on activities and opportunities on the selected topics in China and around the world. The issues focusing on selected topics will be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and published online at <http://gse.sjtu.edu.cn/en/>.

This launching issue of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Guoji Gaodeng Jiaoyu) contains more than 30 articles translated from the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of Boston College, focusing on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research universities, and glob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 主办

主编：刘念才

顾问：菲利普·G·阿特巴赫（美）

编辑：吴 燕

编辑部地址：

上海市东川路 800 号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

邮编：200240

电话：021-34205947*18

电邮：jihe@sjtu.edu.cn

<http://gse.sjtu.edu.cn/kxyj/xskw.htm>

Editor: Nian Cai Liu

Advisor: Philip G. Altbach (USA)

Assistant Editor: Yan Wu

Address: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800, Dongchuan Road

Shanghai, 200240

China

Tel: 86-21-34205947*18

Email: jihe@sjtu.edu.cn

<http://gse.sjtu.edu.cn/kxyj/xskw.htm>

目 录

世界一流大学

世界一流大学的利与弊.....	1
世界一流大学：排名引发的思考.....	4
在小型和发展中国家建设顶尖大学.....	7
世界百强大学的校长.....	9
世界一流大学：美国的经验.....	11
德国的“卓越计划”与大学排名.....	12
日本的“顶尖 30”大学.....	14
世界一流大学与中国高等教育改革.....	16
没有一流高等教育的一流国家：印度 21 世纪的困境.....	18
保持牛津大学的世界一流地位.....	21
世界一流大学：一所拉丁美洲私立大学的追求.....	23

研究型大学

研究型大学与其校长的关系.....	25
发展中国家的大学应停止研发吗？.....	27
拉丁美洲的研究生教育：新时代的来临.....	29
高等教育大众化与超级研究型大学.....	31
最新改革浪潮中的日本国立大学.....	33
处于十字路口的韩国国立大学.....	35
俄罗斯研究型大学的理念.....	36
大学教师的评价与奖励：墨西哥的做法.....	38
在边远地区建设研究型大学：日本的过失.....	41
创业型大学的特征.....	43

对校企合作的再思考：麻省理工、剑桥和东京大学的模式	45
实践型教授与创业型大学	48

高等教育全球化

作为政策工具的大学排名	50
大学排名的困境	53
全球高等教育竞赛	55
从研究生到全球化的世界公民	57
在美国留学的博士生：去留问题的调查	59
科学与工程领域的高等教育趋势	61
全球舞台上的中国大学：大学领导者的视角	63
新加坡环球校园计划中的问题	65
牛津大学全新的管理理念	67

世界一流大学的利与弊

Philip G. Altbach

美国波士顿学院终身教授、国际高等教育中心主任

每个国家都想拥有世界一流大学，似乎没有它便难以前行。但问题是，没人知道世界一流大学究竟是什么，也没人了解如何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然而，每个人都在引用此概念。比如用谷歌（Google）搜索一下，会出现上千个条目，许多高校——从学术性大学到新成立的学院——都宣称自己是“世界一流”。这是一个学术虚夸的年代，各个国家的不同大学都声称自己是世界一流的——但通常几乎没有什么正当理由。那些试图对“世界一流”进行认定的机构，常常并不清楚自己在讨论什么。就像很受尊重的香港《亚洲周刊》那样，几年来一直在给亚洲的大学排名，直到招致了广泛的批评后才停止。本文就是要尝试这种不可能性——为世界一流大学下定义，进而证明作“国家性的”或者“地区性的”学术机构比模仿最富有、最精英的大学还要重要。

19世纪末，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曾经问担任了40年哈佛大学校长的查尔斯·W·埃利奥特（Charles W. Eliot）：创建一所与世界一流大学相当的大学要花费什么？埃利奥特的回答是，需要5,000万美元和200年的时间。他错了！20世纪初叶，芝加哥大学在短短20年间就成了世界一流大学，且只花了5,000万美元多一点——正是由洛克菲勒自己捐赠的。现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费用像吹气球般地飞涨，这不仅仅是因为通货膨胀，还因为学术机构的复杂性增加、花费也不菲了，竞争更是异常激烈。现在，可能需要5亿美元的经费，以及睿智的领导层和鸿运。

因此，世界一流大学并不多。高等教育是分层次、有差别的。本文中，我们只关注那些追求国内和全球高等教育顶尖地位的高校，也就是塔尖上那极小一部分。在美国，最好的大学也是很少的。通常被公认是精英

俱乐部的美国大学协会（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y），也仅有50多名成员（其中有很多还不是世界一流的）。从20世纪初该协会成立以来，会员数只有适度的增长，而全美有大约3,500多所高校。即使在美国，也只有极少数的大学成功地攀登到顶端。在其他国家，最顶层的高校也只是有限的几所，即使政府在预算和使命上对所有的大学基本上一视同仁时的德国也是如此。大部分最杰出的大学只坐落在少数几个国家——20世纪80年代中期，《亚洲华尔街日报》列举了10所最优秀的大学，仅有4所不在美国：剑桥、牛津、巴黎大学（索邦神学院）和东京大学。

当然，正是他人的评价才使得某所大学进入世界一流大学排名，但还没有人解决如何进行适当的国际评价这一难题。我们不可能在此提供指导方针，但该讨论可能是迈向制订相关标准的第一步。

世界一流大学的定义

只有少数几个人尝试为世界一流大学下定义。专家们对以下的几个特征没达成一致意见，我所做的只是努力要建立一些基准，给讨论和分析提供一些基础。字典上对世界一流大学的定义是：“位居全世界最前列；达到卓越的国际标准”。看起来很公平，但问题是在高等教育界，谁来做决定？我们至少可以指出几条位列世界一流所必需的相关特征。

卓越的研究有力地支持着世界一流的理念，即那种由同行认可且扩展知识库的研究。这种研究是可以衡量并交流的。但如果研究是首要因素的话，那就要求大学在其他方面都努力，让卓越的研究成为可能。顶尖的教授当然也是最重要的。要想吸引并留住最优秀的学术成员，必须有良好的工作环境，包括提供工作的安全感——很多国家称其为终

身教职,以及适当的薪水和福利,即使学者未必都期望最高的薪水。一流的教授把自己的工作看作是一种使命,即为了知性的兴趣而献身,而非仅仅是经济利益。

学术自由和学术活力对世界一流大学也是关键的。这意味着,教授和学生必须自由地追寻知识而不考虑其后果如何,自由地发表作品而无需担忧被学术的或者外部的权威所制裁。有些国家虽然允许在非政治的自然科学领域拥有毫无拘束的学术自由,但在更为敏感的社会学和人文学科领域却加以限制。在大部分国家,学术自由已经扩展到学术团体可以对社会和政治问题以及极狭窄的专业领域发表意见。

大学的治理也非常重要。世界一流大学都有内部自治和保持传统的重要措施,且通常是用各种条例来巩固的,以保证学术团体(一般是教授,但有时也包括学生)掌控学术生活的关键要素,即招生、课程、授予学位的标准、新教授的遴选以及学校学术工作的基本方向。

拥有充足的基础设施对学术工作来说也很关键,最先进、最有创造性的研究和最具创新的教学都有赖于合适的图书馆、实验室以及互联网和其他电子资源。随着科学和学术的日益复杂和不断扩展,为其提供足够保障的花费也越来越高。虽然互联网节省了一些费用,并且还可以轻松地获取各种知识,但它决不是万能的。对基础设施的要求已不仅仅是实验室和图书馆,教工和学生还需要足够的工作室。

最后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是必须有足够的资金支持大学的研究、教学以及其他职能。这并不仅仅是维持复杂的学术机构的花费,还必须有一贯的、长期的支持。随着科研复杂性和花费的日益增加,维持研究型大学的费用也在持续增长。大学并不能从自动化带来的生产力提高中获益,教和学始终需要师生的直接接触。时下,经费是个特别的挑战,因为许多政府都正在减少对高等教育的投入,普遍都要求学术机构通过收取学杂费、提供咨询服务和出售研究产品带来的收益以及其他一些创收的活动来支付预算中增加的

部分。然而事实是,公共支持对各地的研究型大学都是必不可少的。只在美国和日本(更少),才存在私立的研究型大学位列前茅。而且在美国也有来自政府的重要补贴,主要是政府研究补贴金以及提供给学生的贷款和助学金。顶尖的私立高校还收到大量捐赠。根据美国的联邦税收制度,对诸如大学这样的非营利性机构捐赠将予以免税,这也是美国一流私立大学发展的重要因素。虽然研究型大学有能力通过各种途径筹集到资金,但持续的大量公共财政的支持是无可替代的。没有它,得到并维持世界一流大学的地位是不可能的。

对争创世界一流大学的告诫

在思考世界一流高等教育机构时,要采取现实而客观的视角看问题。大部分国家,即使是相对富有的大国,也只能甚至说只需要一两所世界一流大学。对很多国家来讲,支持一所世界一流大学已经严重超负荷了。研究型大学位于国家分层化的学术系统的顶层,而下面的学校和顶层的学校是一样重要的。

而且,即使最好的大学,也不是样样都是第一的。比如哈佛的工科就不算最好。所以大多数国家和高校还是建设世界一流的学院、系科、研究所更为合适,特别是那些与本国或本地区经济、社会密切相关的领域。像马来西亚就着重发展信息科学、橡胶技术等对地方经济意义重大的领域。在某种程度上,排名靠前的高校中也有一小部分是专科性的。例如,加州理工学院(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就是一所规模不大、基本上只从事理科教学与研究的学校,然而根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其排名位列全美大学第四。印度理工学院也只关注几个有限的领域,但在印度和国际上却赢得高度尊重。同时,这些学校提供多学科的教育,允许学生选择并保证他们从事跨学科的研究。

总的来看,无人知道如何以学术团体可接受的方式,或者经得起认真推敲的方式对大学进行全球排名,甚或是国内排名。有关学术机构的排名层出不穷,通常强调与大学

地位相关的研究成就特征。但是，极少有排名是由官方机构或著名的研究机构进行的。大部分排名是由报纸或杂志炮制的，只有少数可能被当回事儿。因此，现在是既无有意义的全国排名，也没有可以被广泛接受的世界一流大学定义，所以也无法判定或追求成为这样的大学。美国最高法院法官鲍特·斯图尔特（Potter Stewart）在谈及色情时说过，“当我看到的时候，我就知道了”，但引用这个是不能说明世界一流大学相关问题的。

过分强调世界一流大学的后果

过分地强调获得世界一流大学地位，可能会有损于一所大学、甚至整个学术系统。它可能把精力和资源从更重要的、或许是更实际的目标上挪开；且过于关注建设面向研究和精英的大学，也会忽视培养更多的学生或服务国家需要。大学很可能确立不切实际的期望，而损伤教职工的士气与表现。

世界一流大学的概念反映的是在全球占主导地位的研究型学术机构的规范和价值，特别是美国和西欧的。这种理念基于德国的研究型大学，特别是在美国、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对这种模式认可后，其在19世纪末成为主导的学术思想。尽管全世界所有大学本质上都是西方传统的，但研究型大学的世界一流理想却是那种传统的变种。20世纪5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大卫·里斯曼（David Riesman）指出，美国的大学正在失去多样的学术目标和理念，主要是因为“一种蜿蜒的进程”，即所有的大学都在努力成为像哈佛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一样至关重要的研究型大学。今天，我们也可以做同样的批判，因为全球的大学都好像要朝着这个单一的学术理想努力。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计划开始前，各个学校和国家都要认真审视一下自己的需求、资源和长期利益。

大学是在国内和国际双重背景下运作的。世界一流的理念是全球范围的，因此任何一所大学都是跟全世界最优秀的学术高校

在竞争，并且热切盼望站在卓越和赞誉的塔尖。各国甚至各地区的现实情况都不尽相同，这直接与社会和经济的需求相关，并意味着回应当地社会的要求。基于这些不同的背景，学术表现和职责的本质也各不相同。为一所大学贴上世界一流的标签，而把其他学校都打到学术等级底端的情况虽然可能难以避免，但令人深感遗憾。所以，政策制定者如何根据现实做出决策是不容易的，但却是关键所在。

展望

有关世界一流高等教育的讨论是很重要的。许多政府和学术规划者都在认真思索这个问题，比如中国就有好几所国内顶尖大学自觉地要把自己建设成世界一流。其他的国家，比如韩国，也都对这个想法给予关注。英国这一传统上数所顶尖大学的老家，现在也正担心失去其竞争优势。

有关世界一流大学的讨论有个重要的好处，即它关注于学术标准化和提高、大学在社会中的作用以及学术机构如何适应国内的高等教育系统和国际学术环境中。力求卓越并不是件坏事，竞争也可以激发进步。但是，必须综合考虑现实的可能性并充分体现对公众利益的敏感性。到目前为止，模糊的世界一流大学概念和学术质量的难以衡量，使争创世界一流大学的竞争更加困难。事实上，把高等教育的创新力量和资源集中在更现实、更有用的目标上也许更好。

作者致谢：本文得益于北京师范大学王英杰、新加坡管理大学 Pang Eng Fong 和 Linda Lim 以及哈佛大学 Henry Rosovsky 的思想和论文。我也非常感谢 Edward Shils、Max Weber 和 John Henry Newman 关于大学本质的看法。

译者注：本文译自 Number 33, Fall 2003,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世界一流大学：排名引发的思考

Robert Birnbaum

美国马里兰大学大学城分校高等教育学荣誉退休教授

电子邮箱: rbirnbaum@mail.umd.edu

我不希望说一些危言耸听的话，但从日益增多的文献资料来看，我们正面临世界一流大学排名的危机。问题不是缺少世界一流大学排名，而是排名太多且非常不同。

由于缺乏统一性，全世界的许多大学都声称他们将计划在某一时间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或已经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其中，越南、土耳其、智利、克什米尔、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大学都计划或声称将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泰国已经幸运地具有3所心怀世界一流大学抱负的学校，非洲马里共和国的廷巴克图大学（University of Timbuktu）（该大学在12世纪显然是世界一流大学）已宣称将再次获得世界一流大学地位，哈萨克斯坦的管理、经济及战略研究学院的院长也声称学校具有世界一流大学的地位，尽管无从得到认证。

美国拥有许多被认可或自称为世界一流大学的高校，不仅包括通常所讲的美国大学协会的成员，还包括许多被认为是区域性或地方性的大学。但我发现美国确实有一所名字叫“世界一流大学”的学校。在我发现这一位于田纳西州的学校实际上是理发学校之前，我曾经希望对该校的研究会有价值。

上述问题的出现，全球化可能难辞其咎。有人认为可以构建衡量世界一流的简单方法，运用于全世界所有大学。为了鼓励学者们跳出霸权主义的框框进行思考，我提出了确定世界一流大学的5种其他方法。每种方法都有一个良好的概念基础。

边沁体系 (Bentham System): 该方法以19世纪英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 (Jeremy Bentham) 的功利主义原则为基础，认为最好的大学是那些能给最多的人带来最大快乐的学校。当然，建立新理论所带来的智力上的快乐应包括在边沁体系内，但学生在大学学

习中获得的快乐（不论是在宿舍还是在课堂上获得的），难道不应该获得同样的重视吗？毕竟快乐有很多来源，没有理由让一种来源凌驾于另一种之上。19世纪法国的政治家和美食家让·布里亚·萨瓦兰 (Jean Anthelme Brillat-Savarin) 在其经典著作《味觉生理学》(The Physiology of Taste) 中曾说过，“发现一道新的菜肴带给人类的快乐比发现一个新的行星多。”

奥林匹克体系 (Olympic System): 我们都一致同意大学的排名取决于教师的质量。相关学科的优秀教师能够非常容易地拆解 (deconstruct) 一部小说，推导一个数学公式，或者创作一曲四重奏。一些教师还能跑百米冲刺或游蝶泳。但根据罗马诗人尤维那 (Juvenal) “健康的心理来自健康的身体”的观点，只有真正世界一流的天才才能在计算行星轨道或发现一个新的哲学理论的同时还能参与体操或铅球比赛。在奥林匹克体系中，大学教师的团队每4年参加一次面对面的运动和智力水平的比赛，以决定他们的世界地位。这将最终对“学者-运动员” (scholar-athlete) 这一术语给出清楚明确的定义。

博格斯体系 (Borges System), 该体系以阿根廷作家博格斯 (Jorge Luis Borges) 的小小说《巴别图书馆》(The Library of Babel) 一书提出的模式为基础。该小说假设存在一个无限大的图书馆，在这个图书馆里可以找到所有可能的书，这些书记载着曾经用任意一种语言思考过的全部思想。显而易见，在这个包括过去和未来所有书的图书馆里，肯定有一本关于所有世界大学真正排名的书。没必要详细地进行数据分析以决定世界一流大学：我们学者的任务就像博格斯所精辟概括的那样简单，仅仅是从图书馆中无数相似

的且可能记载着虚假排名信息的各种书中找出那本写有真正的大学排名的书。

香肠体系 (Sausage System): 该体系包含许多不同的大学排名, 每个排名的结果都不相同, 把不同排名的缺点转化为优点。由于很难(也不可能)对排名指标的重要性达成一致, 因此赋予指标权重意义不大, 可以通过简单加和获得结果。把《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辜曼报告》(Gourman Report)、《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等各种排名放在一起, 将其结果相加并取平均值。还可以加上最佳校报排名、社区参与度排名、学校多样性排名、派对最好的学校排名、全美大学生运动协会的体育项目排名。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 就像我们不知道香肠是怎么做的(或者我们也不想知道), 人们很难明白香肠体系的排名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不透明是香肠体系的特点。该体系拒绝“不是/就是”(either/or)的概念, 而接受更有包容性的“和”(both/and)的概念。

沃伯根湖体系 (Lake Wobegon System): 所有的世界一流大学排名都对所包含的大学数量加以人为的限制。如, 在当前的体系内, 世界前 20 所顶尖大学排名的清单中将只包括 20 所大学。但在沃伯根湖中, 请牢记, 所有的孩子都在平均值以上。这意味着仅通过增加每一类别中大学数量, 就可以扩大世界一流大学的数目。比如世界前 20 所顶尖大学排名中可能有 30 所大学, 随着经验的增长我们可以扩大数目。美国至少有 50 所研究型大学已表明希望跻身于世界前 20 名大学之列。在当前的排名体系下, 很多大学将注定以失败而告终, 但在沃伯根湖体系中绝大部分大学将能实现其抱负。

这些方法仅仅为我们换一种方法确定世界一流大学的探索提供了一个开端。我相信其他学者将会提出对大学进行排名的其他方法。例如, 肯内斯·雷 (Kenneth Lay) 体系可以根据毕业生的总收入对大学进行比较; 罗伯特·普特南 (Robert Putnam) 体系可以基于大学对社会资本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对大学进行排名; 克米特 (Kermit) 体系可以评价大学对可持续发展所做的贡献。

我的建议, 尽管有些开玩笑, 但不能认为是贬低世界一流大学。这些高校有利于塑造我们人类的文明, 是原创思想的精神堡垒, 满足人类对知识的基本需求。确实有许多世界一流大学, 即使我们对世界一流大学的具体数目和定义还没有形成共识。但在一个充满饥荒、种族灭绝、战争、由疾病导致的无法阻止的死亡、甚至没有饮用水等问题的星球上, 很难看出优先考虑建设新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必要性。那些考虑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国家最起码应该考虑一下将高等教育经费投入到其他方面的可能性。

在建成更多的精英大学之前, 我们应重点关注加强现在所认为的二流或三流大学的实力。丹尼尔·丹尼特 (Daniel Dennett) 曾打过一个比方, 教育政策是用起重机而不是空中吊钩作材料的。起重器立于坚实的地面, 而空中吊钩带有一些不需要任何地球的支持就能举起东西的超自然力量。起重机虽然需要时间和巨大的努力, 但确实能发挥作用; 而空中吊钩可以很快建立, 几乎不需要努力, 但不能发挥作用。我们应该用起重机为材料, 以强大而富裕的教育和社会为基础, 经过多年的努力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试图通过移植模式和投入大量经费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会像空中吊钩一样, 终将以失败而告终。试图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而不事先考虑大学所存在的教育和社会基础, 如伊凡·伊里奇 (Ivan Illich) 曾说的, “就像从第十二层开始对纽约市进行城市改革。”

现在各国真正需要的不是建立更多的世界一流大学, 而是建立更多的世界一流技术学院、世界一流社区学院、世界一流农业学院、世界一流师范学院、世界一流的地区国立大学。美国并不是因为拥有许多世界一流大学而拥有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体系的; 相反, 美国是因为有一个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体系, 才有世界一流大学的。

大学排名试图做到客观和科学, 但事实上它们都体现着设定高等教育目标的意识形态。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 “世界一流”越来越成为“西方”的同义词。这意味着科学、研究和投入更多的经费, 贫穷国家是不能在这

些领域与发达国家展开竞争的。遵守“普遍标准”的压力是永远存在的，因此一所被认为在其所在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大学用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来看可能还是失败的。当各国注重高校的实力提高及多元化时，不应该从如何模仿西方大学的角度来评价这些国家的大

学是否卓越，而应从他们怎样成功地利用本国丰富的传统和文化以形成各自独特个性的角度来评价其是否卓越。

译者注：本文译自 Number 47, Spring 2007,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在小型和发展中国家建设顶尖大学

Pang Eng Fong, Linda Lim

Pang Eng Fong: 新加坡管理大学教授; 电子邮箱: efpang@smu.edu.sg

Linda Lim: 美国密西根大学安娜堡分校教授; 电子邮箱: lylim@umich.edu

绝大多数大学现在都面临着挑战,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公立大学。经费预算的限制迫使许多公立大学削减成本和教育项目。同时, 不断变化的期望使公立大学承担新的功能和角色。例如, 东亚的国家期望公立大学发展成为研究型大学, 与产业界建立联系以提高国家的经济竞争力。为了有效地实现这一期望, 人们认为公立大学必须跻身“世界一流”, 与西方最好的大学展开竞争。

人们公认西方最优秀的大学在美国, 美国的大学因其卓越和创造性而著称于世。美国的大学的科学研究产生了改变美国和世界的新思想与新产品。但较少人知道美国的大学和学院在规模和定位方面是高度分化的。大学和学院的多样性使其各有专长, 并且赋予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以弹性。但美国的大学, 尤其是研究型大学也受到批判。批评者们认为研究型大学过分关注科研而忽略了大学从事教学和为社会服务的职能。

美国模式: 能被模仿吗?

小国或发展中国家的大学所面临的问题是, 美国研究型大学模式是否是一个正确的榜样, 因为该模式是在应对特定的条件和环境时形成的。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是, 不发达国家是否准备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为大学提供丰富的资源, 以使其能与美国知名大学竞争优秀的师资。

在绝大部分国家, 国立大学是由政府提供经费支持的综合性大学。它们不具有美国大学的规模和多样性, 也不容易延揽世界著名的学者教授或从公共和私有部门获得充足的科研经费。

在美国的研究型大学, 教师的科研在绝大部分学科是根据在同行审稿的国际学术期

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进行评价的。在这一评价过程中, 同一研究领域的学者对投稿的学术论文进行审阅, 并决定该文章是否值得在某一学术期刊上发表。“排名最高”的学术期刊往往是那些“纯”科学领域的期刊。

那些对交叉学科、新兴领域、地域特有或政策问题感兴趣的教师, 在国际顶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时可能遇到困难。对小国家或发展中国家来说具有重要意义的科研问题也许不会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兴趣, 也没有实证数据可供最先进的检验方法使用。

研究的主题或学科不同, 许多事情也都不相同。在纯科学领域, 衡量科研卓越的全球基准可能只有一个。但在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和职业科学领域, 全球基准可能并不能充分把握当地和地区的特征。

无形的因素

根据美国研究型大学特点建立的“国际标准”可能会被其他国家所采用。模仿这一模式的困难在于, 有很多因素是无形的, 如学术研究和讨论的悠久传统、对学术自由的保护、学术自治、教授治学以及文化包容与多样性。

这些无形的因素既鼓励科研, 又促进教学, 在科研和教学的互动中鼓励学生与授课教师开展批判性思维和公开讨论。这些无形的因素吸引着人们从事大学教师这一职业, 尽管该职业所提供的物质回报远远低于其他部门和职业。

本土核心问题的重要性

东亚地区像其他地区一样, 大学是国家智力资本的一部分。人们日益意识到外国的理念和杰出人才的必要性, 同时也意识到培

养本土教师的重要性，让获得公共支持的大学具有稳定性和本土的特点，扎根于本土的文化和智力资源。

主要根据在“国际顶尖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数量作为教师晋升的评价指标，将阻碍地方特定问题的应用研究和论文发表。这样的评价标准也剥脱了本土知识和政策研究存在的空间。此外，它也没有兼顾智力氛围和文化生活，阻碍本土实力的发展

以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为目标聘用的外国学者，不太可能具有开展地方研究所需要的知识、兴趣和动力。其中一些学者可能会利用其职位来提高自己的全球流动能力。最好的结果可能就是这些学者所在的大学与外国研究型大学在当地开设的分校一样。国家可能会为了世界市场，为外国学者提供科研经费。尽管大学由于吸引外国学者而获得了学术声誉，但所发表的学术论文与提供资助的国家的需求毫不相关。

许多亚洲国家已建立了若干本土的和外来的私立高校，以便满足对人力培训的私人需求。国立高校必须发挥其他功能，这些功能是营利性高校、特别是外来高校所不能发挥的功能，即开展科研（尤其是地方特定问题研究）、服务社区和参与政策制定。这一社会和公共职能对市民社会的形成和生活质量的提高是至关重要的。

国际标准和本土需求之间的平衡

小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所面临的挑战是在国际学术标准与本国的需求、本土的认同和文化之间做出平衡。例如，有 3 所大学的新加坡可以在特定的学科领域成为全世界了解东南亚地区的门户，这主要通过为本国和外国学者在相关学术领域发表国际领先的论文建立渠道而实现。

在欧洲、澳大利亚和日本，本土的高校和学者必须在确定真正的全球标准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建立与出自美国的标准所不同的标准。与此同时，那些选择从事国际学术期刊所欢迎的科学研究的学者将继续从事那些研究。灵活、及时适应、适时调整和成熟是从美国的研究型大学模式中吸取精华的关键。

幸运的是，美国模式的许多优点实施起来既不昂贵也不太花费时间，包括：不再仅仅根据成绩、在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排名和成绩积点来招生、评价教师和学生；从国家管理大学转变为教师自己管理学术生活和大学；在所有理性讨论的“安全地带”，允许不同的理念、观点和学者进行学术争鸣。那些希望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国家还应该在社会和政府方面做出相应调整。

译者注：本文译自 Number 33, Fall 2003,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世界百强大学的校长

Amanda Goodall

英国华威大学华威商学院

电子邮箱: Amanda@amandagoodall.com

研究型大学对国民和经济的重要性是不可置疑的。研究型大学的领导者和治理问题也同样重要。日益增加的竞争导致研究型大学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此也带来了大学领导者角色的重大变化。已有很多文献对大学领导者的问题进行了探索和研究,但真正有关世界大学校长的文献很少,尤其是世界顶尖研究型大学的校长。

本文对世界前100名顶尖大学(简称世界百强大学)的校长进行了特征研究,以便理解其成功的经验。本文将解决一个具体的问题:世界顶尖大学的校长都是顶尖的学者吗?如果候选人数量最多的顶尖大学全都选聘顶尖的研究者担任校长的话,这或许能从一个方面证明优秀学者的科研水平越高,越有可能成为出色的大学校长。

当考察世界百强大学的校长时,既会发现许多诺贝尔奖获得者,还会发现有些人只有很少或没有论文引用数(本研究中所使用的引用信息来自Web of Science)。从这一事实可得出一个结论,校长的科研产出与是否担任校长之间并不存在系统的相关性。但大学校长的科研背景与该大学在世界排名中的位置之间存有显著的相关性。

“顶尖”研究型大学的界定

随着高等教育的全球化,出现了学生和教师的全球流动,世界大学排名也应运而生。2003年,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发布了第一个“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建立该排名的初衷是他们想知道中国的大学离世界一流大学有多远。

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大学学术排名”的一个优势是,它不是由报纸或杂志建立的。该排名采用的指标包括学术或科研成果、高引

用科学家的数量和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人数等。尽管在方法上还存在一些问题,但上海交通大学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无疑是为数不多的世界大学排名中最好的一个。

世界百强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2004年“世界大学学术排名”的结果显示,美国大学在世界百强大学中占绝对优势,有51所大学入选。美国大学不均匀地分布在世界前100位。世界前20名大学中,美国有17所;世界前40名大学中,美国有30所。在世界百强大学中,美国只有4所大学在后20位。

在世界百强大学中,欧洲有37所。其中,英国11所,德国7所,法国和瑞典各4所,瑞士3所,荷兰2所,奥地利、丹麦、芬兰、挪威、意大利和俄罗斯各1所。美国和欧洲以外国家有12所,其中日本5所,加拿大4所,澳大利亚2所,以色列1所。

谁是世界百强大学的校长?

世界百强大学的国家分布并不能反映其大学校长的国籍情况。例如,世界前10名的大学主要在两个国家,美国8所,英国2所。但这10所大学的校长来自4个国家,分别是加拿大、新西兰、英国和美国。

在世界百强大学的校长中,有15位是女性。特别有趣的是,在这15位女校长中,有6位是世界前20名大学的校长,有10位是世界前50名大学的校长。因此在世界百强大学的顶尖大学中找到女校长的情况更普遍。就女校长所在大学的国家分布而言,北美占绝对优势——美国有9位女校长,加拿大有2位。剩下的4位女校长分布在丹麦、法国、瑞典和英国。

世界百强大学的校长都具有博士学位。其中绝大部分校长都是学者，只有2位大学校长的大部分职业生涯是在企业或政府的非学术职位上，还有一小部分校长曾经直接参与学术管理活动。

确定大学校长的年龄困难比较大。一些欧洲大学公布其大学校长的出生信息，尽管这样的大学数量比较少。可以利用大学校长获得第一学位的时间信息大概估算出其年龄。通过这一方法，估算出的世界百强大学校长的平均年龄为59岁。

对世界百强大学校长的学科背景进行分析也非常有趣。52位校长来自自然科学领域，其中占绝对优势的是生物学家（占50%），其余的还包括11名工程师、6名物理学家、5名化学家和4名计算机科学家。

在世界百强大学的校长中，有37人是社会科学家，其中法律领域的学者最多，有15人。第二组16位校长的学科平均分布在教育学、政治学、社会学以及公共和社会学。最后，还有6位是经济学家。只有11位大学校长来自人文艺术领域。自20世纪初期以来，出身于人文和艺术领域的校长人数逐渐下降，人文和艺术曾经是主要来源学科。

顶尖学者领导顶尖大学

根据按学科标准化的论文引用情况对世界百强大学校长研究经历进行的统计，有12位大学校长发表的论文引用数极高，在各自所在的领域能排到前250名（见 www.isihighlycited.com）。这样的校长在顶尖大学中更

加常见。其中6人是世界前20名大学的校长，3人是前21-40名大学的，2人是前41-60名的，1人是前61-100名的。在这些大学校长中，有3人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全是医学领域的），其中2人是世界前20名大学的校长，1人是世界前20-40名大学的。

先对每位校长所发论文的引用数进行合计，并根据学科标准化，然后再与该校长所在大学的世界排名联系起来考察，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大学的排名越靠前，其校长所发表论文的引用数也可能越高。世界前50名大学校长的引用数是世界前51-100名大学校长的2.5倍。世界前20名大学校长所发论文的引用数是世界前81-100名大学校长的5倍。换言之，大学越优秀，所聘用的校长就越优秀。

结论

大学的排名位置和校长科研经历之间的简单联系并不能解释为因果关系，还需要开展进一步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结果的确表明，如果大学校长是一个成功的学者，将有利于他（她）成为一个优秀的管理者和校长。大学的核心工作是开展科研和研究性教学。一个对这些核心工作理解深刻的校长可能对大学的发展起巨大作用。

作者注：欲获得更详细的研究结果可与作者联系。

译者注：本文译自 Number 42, Winter 2006,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世界一流大学：美国的经验

Charles M. Vest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校长

在《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最新发布的世界前 200 所大学排名中，前 3 名都是美国的大学，分别为哈佛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麻省理工学院。

美国的大学在竞争激烈的大学排名中表现出色是有充分的理由的，其他国家可以通过考量帮助美国大学获得这种成就的体制和政策因素，得到有益的经验。

但在决定高等教育未来方面，合作比竞争具有更为深远的重要作用。非正式的全球合作已经开始创建无墙大学（meta-university），将在全球范围内共享最优秀的学术研究和教育。

在我看来，美国高等教育卓越和成功的原因包括：高校的多样化，从小规模的文理学院到大规模的公立和私立大学都有，为学生选择最能满足其需求的大学提供了机会；新的助理教授有教学的自由和科研的自由；美国研究型大学采用多种方式将教学和科研整合在一起，使科研和教学在相互作用下获得新的发展；美国大学从全世界招收和延揽学生和教师，这些海外学生和教师所具有的丰富的智力和文化有助于形成美国大学的特征；为美国大学的前沿研究提供支持一直是联邦政府的重要职责，政府在市场竞争理念的指导下，根据研究者的绩效提供研究经费；由美国税收法所形成的慈善传统，鼓励校友和其他人士为高校提供支持，这些人所提供的经费使来自于中等收入家庭的资优学生有机会进入最昂贵的学校学习；教师和学生的公开竞争促进了卓越的形成。

这些因素可以与其他国家的政治和文化背景结合在一起，但可能还需要进一步改进。印度理工学院（创建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巨大成功和影响表明，基于研究型大学模式的知名大学可以在世界各地迅速崛起。

环境是不断发生变化的，而不是静止不

变的。德国正在努力将非常有实力但独立的马普学会（Max Planck Research Institutes）与德国的大学更好地整合在一起，以便利用教学和研究结合后所带来的动力。在英国，入学机会、学费可承受能力和学费最高额度问题都是激烈争论的主题，诸如剑桥-麻省理工学院（Cambridge-MIT Institute）等具有远见的活动，试图将英国大学的智力优势与国家的竞争力、生产力和产业更好地联系在一起。中国已经开始致力于将其国内若干所大学建成为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新加坡、墨西哥等许多国家也开始了同样的工作。未来 50 年将在研究生培养和科研方面出现良性竞争，但是合作也非常重要。

因特网和互联网将使全球科研合作、知识共享和教育资源的共同创造成为可能。本土的大学不会被取代。但是，世界各地的个人和群体通过网络可以使每所大学的教学和知识创造得到提高。这样的技术转变可以被看作是出现了无墙大学。当然，学者和教师一直都通过参加会议、开展讨论和书信来往共同促进进步。但是参与的规模、传播的速度以及成果获得和展示的复杂性都将是前所未有的。

促进这种全球合作新模式的催化剂就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开放课程项目，它使得所有的教师和学生都可以通过因特网免费获得我们学校所有学科的基本教学资源。住宿大学将仍然是供优秀的学生和有献身精神的教师与学者一起生活和学习最好的场所。通过与美国大学的竞争以及对美国大学模式中有益做法的吸收，大学的质量将获得提高。但是，通过电子网络使教师和研究者开展全球合作的无墙大学，将迅速促进和改善世界各地的高等教育。

译者注：本文译自 Number 38, Winter 2005,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德国的“卓越计划”与大学排名

Barbara M. Kehm

德国卡塞尔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教授

电子邮箱: kehm@hochschulforschung.uni-kassel.de

2004年1月,当时的德国联邦政府教育和研究部部长、社会民主党人士埃德尔加德·布尔曼(Edelgard Bulmahn)公开提出了在德国现有的大学中实施竞争额外经费(相当大的数目)计划的建议,以便确定10所具有成为精英大学潜力的大学。由于支持和促进精英大学建设,这一建议导致德国大部分高等教育利益相关者提出了抗议,并打破了长期以来的社会民主党的禁忌。自二战以来(或二战前),社会民主党的教育和高等教育政策都是开放式入学、平等的入学机会以及把教育当作公共而非私人产品,因此不收取学费,对同一类型的高校都一视同仁。这些观点并不必然与排名和精英大学相矛盾,但备受争议的是将财政经费拨给少数大学将会降低其他大学的地位,并从其他大学拿走许多必要的经费。

作为唯一表示支持甚至赞赏这一计划的利益相关者,雇主们认为德国高校总体上是好的,但缺乏“佼佼者”。

德国16个州负责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官员立即对这一建议提出了抗议。尽管他们有兴趣从联邦政府获得高等教育经费,但他们把该计划看作是联邦政府企图干预州政府所负责领域的又一次尝试,因此非常讨厌该计划。他们执意要求进行协商,政府间的协商旋即展开。

折中方案

2004年3月,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一致同意了一个含有竞争概念的折中方案,但经费问题还在商谈中。总体上说,大学通过递交各自的方案,可以在三个领域竞争额外的经费支持:(1)研究生院;(2)具有国际声誉的“卓越集群”;(3)“未来发展构想”。为符

合竞争条件成为精英大学,一所高校必须成功地获得至少一个研究生院和一个“卓越集群”项目。此外,学校还必须递交一个完整连贯的、令人信服的发展计划。

2004年6月,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就经费问题最终达成了一致。到2010年,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共计划向“卓越计划”投资19亿欧元(约合23亿美元)。2006-2010年,联邦政府将每年向“卓越计划”提供2.5亿欧元,各州政府每年提供1.3亿欧元(两者合计每年约4.53亿美元)。额外的经费在“卓越计划”重点建设的三个领域分配如下:(1)建设大约40个促进初级研究人员教育和培训的研究生院,每个每年可获得约100万欧元;(2)建设大约30个促进尖端研究的“卓越集群”,每个“卓越集群”每年可获得约800万欧元;(3)根据大学的发展状况和研究优势建设10所顶尖大学,以促进德国高等教育结构的进一步优化,每所大学每年约获得2,500万欧元的额外经费。

谁获得了额外的经费?

方案形成后,成立了一个由德国研究协会(German Research Association,相当于一个研究委员会)和科学委员会(Science Council,一个在德国高等教育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缓冲组织)的代表组成的联合委员会。委员会的任务是在三个高等教育领域制定申请提交指南,并组织筛选过程。该委员会决定分两个阶段组织筛选过程。首先,德国大学就三个领域(研究生院、“卓越集群”和“未来发展构想”)中的任何一个递交总体发展理念。只有成功通过第一轮筛选的大学才被要求递交详细的发展方案。

2006年1月20日,联合委员会公布了

第一轮筛选的结果。对于递交了“未来发展构想”的大学来说，那是一个充满希望和担忧的日子，因为大家都知道并不是所有的申请都被接受。被淘汰意味着将对大学的声誉产生不利的影响。大众媒体几个星期以来一直在猜测哪些大学将成为官方认可的德国首批 10 所精英大学。

就“研究生院”类来看，共收到 135 份申请，少数几所大学递交了一份以上的申请，其中 39 份被接受。就“卓越集群”来看，共收到 157 份申请，同样地，有些大学提交了一份以上的申请，一共有 41 份申请被批准。德国慕尼黑大学是最大的赢家，共有 4 份申请被批准。最后，共有 27 所大学提交了“未来发展构想”。未来的精英大学将根据这些被提交的申请挑选，对那些被淘汰的大学来说结果是令人沮丧的。最终入选的 10 所大学是：亚琛工业大学、柏林自由大学、不来梅大学（University of Bremen）、弗莱堡大学（University of Freiburg）、海德堡大学（University of Heidelb）、卡尔斯鲁厄工业大学（Technical University Karlsruhe）、慕尼黑大学、慕尼黑工业大学（Technical University of Munich）、蒂宾根大学（University of Tübingen）和维尔茨堡大学（University of Würzburg）。

这些大学的地区分布非常有趣。有 4 所大学分布在巴登-符腾堡州（Baden-Württemberg），3 所大学在巴伐利亚州（Bavaria），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Northrhine-Westfalia）、不来梅州（Bremen）和柏林各有 1 所大学。就学科分布来看，大约 1/3 申请获得成功的“卓越集群”项目来自医学和生命科学，1/4 来自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领域，10% 强的来自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在“研究生院”项目中值得注意的是，许多申请都带有明显的跨学科倾向，其他申请所涉及的学科群基本上均匀分布。

共有 36 所德国大学将就其申请的领域递交详细方案。第二轮筛选将在 2006 年 10 月结束。

未来的发展？

尽管“卓越计划”并没有被正式看作是将大学排名引进德国高等教育的措施，但在某种程度上它尝试了对大学进行区分。有趣的是，德国高校分化的方向可能造成与博洛尼亚改革进程所带来的发展之间的紧张关系。博洛尼亚改革进程引入了分为博士教育、硕士教育和本科教育的三层专业教育和学位系统。德国以及欧洲其他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都是包括大学和高等专科学校（Fachhochschulen）在内的二元体系，博洛尼亚改革进程将使两类高校之间的界限模糊。尽管授予博士学位仍然是大学的专有特权，但两类高校现在都可以提供本科和硕士教育，专业型和学术型硕士教育之间的差异不一定清晰。这导致两类高校在硕士教育领域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但“卓越计划”仅以大学为目标，高等专科学校不能申请。德国高等教育专家一致认为“卓越计划”最终将导致一种新的分化模式。将出现由一小部分顶尖大学组成的“精英集群”，即顶尖集群。中间集群规模大一些，它们把自己看作是研究型大学，但只有非常渺茫的机会升格到第一集群。最后，还有一大群高校将在本科生教育领域展开竞争，其中大部分是高等专科学校，也有一部分大学。这些学校可能也提供一些硕士教育项目，但几乎没有科学研究，活动主要集中于教学。德国高校多样性的有趣方面体现在每种类型高校的边缘，包括高校在顶尖集群和中间集群之间的双向流动，以及高校在中间集群和底层集群之间的双向流动。并不需要给每所大学确定具体的排名位置，而是给出一个群组。

目前已经看到的是，与以往相比，“卓越计划”确实在德国的大学之间引发了更多的竞争。然而，它是否会成为建立德国大学排名的第一步，还需拭目以待。

译者注：本文译自 Number 44, Summer 2006,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日本的“顶尖 30”大学

William Currie, S. J

日本东京上智大学 (Sophia University) 校长

电子邮箱: w-currie@sophia.ac.jp

由于持续的经济萧条和 18 岁人口的迅速下降,近年来已深陷众多压力之中的日本私立大学目前正面临着令人头疼的新问题。文部省 2002 年 6 月宣布其正在修改向私立大学划拨财政资助的方式。

到目前为止,拨款标准一直非常客观和简单。具有合理的师生比、生均图书量和人均教学面积等特点的私立大学比那些招收的学生数超过其所能容纳限额的高校获得了更多的财政资助。

现在文部省宣布将集中精力提高日本“顶尖 30 (Top 30)”大学的水平,以便这些学校能与其他世界一流大学竞争。“顶尖 30”大学将包括国立大学(目前主要由国家政府提供财政经费)、公立大学(绝大部分经费由建立这些学校的地方政府提供)和能有效自给的私立大学(经费主要来源于学费和捐赠,顺便提一句,其捐赠收入远远少于美国大学)。

到目前为止,日本政府向私立大学提供的补贴主要是科学研究目前所必需的支出,因此有助于避免学费上涨的幅度太大。日本政府也为私立大学提供购买教学和科研设备的经费。

根据新方案,文部省将转变投资重点,这样私立大学所获得的财政经费将减少 10%。从现在开始,私立大学在争取政府对值得列入“顶尖 30”计划的研究生专业方面,必须与公立和国立大学进行竞争。

文部省要求大学校长向其递交对特定研究生教育项目的财政补贴计划,这些计划将由文部省指定的“第三方评审专家”进行评估。可想而知,这一政策变化将引起私立大学管理者的极大关注。到目前为止,国立和公立大学通常比私立大学拥有更多可供支配的预算,建立起出色的教师队伍和先进的科

研设施,尤其是在科学和工程领域。这些教师的科学研究很成功,但通常以牺牲本科生教育为代价。由于文部省强调的研究领域和评选“顶尖 30”大学的评价标准,私立大学管理者的担忧更加剧了。在文部省 6 月份公布的主要研究领域名单中,第一位的是生命科学,包括生命科学、生物学、医学工程、农学和药学。第二位的是医学,包括口腔医学、护理学和公共卫生。排在第三位的是数学和物理,紧接着是化学和地球科学。第五位的学科领域是通信和电子工程,紧随其后的是机械工程、系统工程和冶金学。第七个领域是土木工程和建筑。第八个领域是第一次提及的人文学科,文学、历史学、哲学、心理学、教育学、戏剧学、语言学和美术都被放在了同一类中。第九个领域是社会科学,包括法律、政治学、经济学、商学、社会学和公共规划学。最后一类包括环境研究、社会福利学、能源研究和国际关系等学科。

文部省评选“顶尖 30”大学的“客观标准”是什么?文部省列举的例子包括在同行审稿的学术期刊上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数、教师的学术论文被其他学者引用的次数、在国际会议上宣读的论文数、研究生在学术会议上做学术汇报的次数、已经获得和正在申请的专利数。评估人员还将根据获得诺贝尔奖的教师数、获得日本科学院荣誉的人数、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数以及具有海外学习经历的教师数等对大学进行评估,这些也都是数量指标。

另一标准是教师从政府和私有部门申请到的科研经费数。与商业的稳固联系也被认为是重要的因素,尤其是联合科研项目。研究生完成学业的专业表现、研究生学位授予数等也将是指标之一。最后一组指标与大学的整体管理有关,包括校长发挥了多少领导

职能？对教师的发展有多重视？外界对学校的评价如何？学校的图书馆怎样？计算机设施怎样？学生评价课堂教学是否在大学中得以实施？

对理学、工学和医学等关键领域的强调，以及评价标准本身，都迎合了国立和公立大学的优势，以致文部省公布这一方案后不久，一家重要的杂志《朝日周刊》(Asahi Weekly)就预测了入选“顶尖 30”大学的名单，只有一所私立大学榜上有名，即庆应义塾大学(Keio University)。根据《朝日周刊》的排名，著名的早稻田大学(Waseda University)是另一所进入“顶尖 40”大学的私立大学。

三年前，由教育家、商业人士和政府官员等组成的大学委员会发表了一份极其不错的关于日本高等教育改革的文件。除了其他问题，该文件还强调了本科教育和通识教育

的重要性，为学生进入某一专业领域学习前提供了广阔的视野。该报告尤其鼓励每一所大学突出其自身的特点和个性，这令私立大学非常满意。现在，文部省似乎正在转向另一个方向，开始强调竞争，尤其强调理科和工科的研究生教育。

目前日本有 649 所四年制大学：99 所国立大学、72 所公立大学和 478 所私立大学。今年 30% 的私立大学没有完成自己的新生入学人数指标。随着日本高等教育的这些最新发展，未来的几年里将会有多少私立大学被迫关闭或与其他学校合并？

请继续关注进一步的发展。

译者注：本文译自 Number 26, Winter 2002,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世界一流大学与中国高等教育改革

Kathryn Monrman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霍普金斯-南京中心执行主任

电子邮箱: kmohrman@jhu.edu

中国领导人迫切地希望拥有一个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体系，一方面是为了能向国家未来的领导者提供优质的教育，另一方面是为了在全世界赢得更多的尊重。因此，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 1998 年提出了在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几所顶尖大学获得了为期三年的专项经费用于提高质量，即“985 工程”。例如，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在“985 工程”一期各获得 18 亿人民币（相当于 2.25 亿美元）的建设经费，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和南京大学各获得 12 亿元人民币（相当于 1.5 亿美元）。这些经费是在“211 工程”专项经费之外又增加的经费，“211 工程”的目标是在 21 世纪建设 100 所顶尖大学。“985 工程”反映出中国政府在有意地对于那些非常有潜力在国际学术市场上获得成功的大学进行集中投资。同时“985 工程”也意味着中国已经意识到不可能建成 100 所国际知名的大学，至少在短时期内不可能。

国际竞争力

尽管中国学者认为最重要的是在国际期刊上发表更多的论文，尤其是在自然和物理科学领域，但关于世界一流大学尚没有一致的定义。其他标准与美国大学的想法相似，包括更多的大楼、更多的出版物、最先进的实验室设备、著名的教授以及更多经费。

中国对世界一流大学的想法看起来很大程度上带有模仿性，而不是创造性。为了争取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中国的顶尖大学经常将自己与牛津大学、耶鲁大学和索邦大学进行对比，哪怕并不具备西方大学的悠久历史以及令人羡慕的充足的经费资源。因此，甚至中国最顶尖的大学，也很难在许多学术领域与国外大学直接进行竞争。

另一方面，尽管中国具有历史悠久且与西方不同的学术传统，然而今天的中国学术界很少有人提及中国学者具有相对优势的领域。对自然和物理科学的强调迫使中国学者在科学研究方面奋力追赶西方，但更加重视人文和社会科学有可能发挥中国的传统优势。中国可能相当有兴趣去了解一种新的定义，即世界一流大学并不是简单地模仿哈佛大学，而是创造性地将东西方最好的传统结合起来。

世界一流大学的定义

世界一流大学的定义是一个许多大学领导者都在讨论的热门话题。香港中文大学前任校长金耀基（Ambrose King）认为世界一流大学应具备三个特征：第一，拥有高水平的师资队伍，他们能在各自领域内得到公认的顶尖期刊上定期发表研究成果；第二，真正国际化的研究生；第三，培养的毕业生适合在全世界各地工作。

布朗大学校长鲁斯·西蒙斯（Ruth Simmons）在一篇发表在《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003 年 1 月 18 日）题为“如何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文章中提出了一种不同的看法。她认为一流的高等教育体系应该建立在它所处的社会文化之上，大学是帮助社会进一步深化具体目标的重要机构。她强调，“美国大学质量的基础是同行评价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由该领域的领袖设定标准，并且这些领袖本身也要接受其他同行的挑战与评价”。通过展望未来，西蒙斯认为“大学提升着学者从事原创性工作的能力，这些研究并不是可以立即得以应用的。一流的大学不仅仅有益于所处的时代，而且还在为未来做准备。这就需要国家尽可能少地干

预大学。国家的作用在于提供资源，以及宽阔的空间，让大学里的科研人才自行决定如何发展学术”。最后，她警告说“教育永远不应该成为生产流水线。一旦成为流水线，虽然可以生产特定的产品，但是培养不出使一个民主社会运作起来的大量具有创造性的思考者。”

菲利普·阿特巴赫在“世界一流大学的利与弊”一文(Academe, January-February 2004)中对世界一流大学进行了描述。他罗列了一系列特征，作为分析大学国际竞争力的基准，包括：(1)卓越的学术研究；(2)优秀的师资队伍，大学为其提供稳定的工作、合适的收入和福利以及充足的实验设备；(3)学术自由和智力碰撞的氛围；(4)追求知识的自由；(5)内部自治的重要措施；(6)持续和充足的公共经费。

在每一个定义中，学术领导者都提到了数量和质量、智力探索和创新的氛围、关注大学为社会所带来的长期和短期贡献。然而，一个国际认可的学术氛围需要长期发展才能形成，远比中国学者和政治领导者想象得漫长。仅仅购买先进的实验设备或激励发表更多的学术论文并不能保证形成欧洲和美国大学几百年来所发展起来的学术氛围。许多中国学术领导者也承认了这一现实，他们认为在中国需要一代人的努力才能真正建成世界

一流大学。

对世界一流大学的渴望

有关世界一流大学的讨论促使人们思考在高等教育领域将西方学术传统移植到中国的长期后果。这些改变是否会让中国的大学采取美国大学所具有的高度个性化精神？这种精神所蕴含着令学校感到失望的方面。这些价值观是否会流入社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政府部门是否会允许推进西方社会所倡导的学术自由？中国学术界是否会继续从自身之外寻求卓越的标准，这可能意味着西方的教育标准是高级的，中国大学的标准是低级的？更极端地说，一旦中国的大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中国大学不同于国际上其他同类大学的特点是什么？

作者注：本文是在2005年3月出版的Cheng Li编著的《联结太平洋两岸的桥梁：美中教育交流，1978-2003》(Bridging Minds Across the Pacific: U.S.-China Educational Exchanges, 1978-2003)其中一章的基础上写成的。

译者注：本文译自 Number 39, Spring 2005,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没有一流高等教育的一流国家：印度 21 世纪的困境

Philip G. Altbach

美国波士顿学院终身教授、国际高等教育中心主任

印度正在向经济腾飞和现代化快速迈进，通过信息技术和生物科技等高科技产业使国家走向繁荣。印度最近宣布将不再生产没有专利的廉价普通药品，这一决定不仅符合世界贸易组织的现实要求，同时也给国内制药产业带来了与跨国公司开展竞争的挑战。不幸的是，印度薄弱的高等教育体系是这一战略中唯一致命的弱点。最近几年印度系统地减少对高等教育的经费投入，导致了高等教育体系的平庸，既没有世界一流的科学研究，也没有培养出优秀的学者、科学家和管理者来维持高科技的发展。

印度的主要竞争对手——中国以及新加坡和韩国，正在为建立一个大规模的、分化的高等教育体系而投资。这些国家既在高等教育体系的底层为大量的学生提供入学机会，同时又在建设若干能与世界一流大学相竞争的研究型大学。在伦敦《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最近公布的世界前 200 所大学排名中，有 3 所中国大陆的大学，3 所中国香港的大学，3 所韩国的大学，1 所中国台湾地区的大学和 1 所印度的大学（印度理工学院位居 41，但具体的校区没有提及）。

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正致力于在即将到来的知识经济中扮演领导者的角色。曾经有一段时期，国家凭借廉价的劳动力和科技含量较低的制造加工业就可以获得经济的腾飞。廉价的劳动力仍然是一个有利的因素，但国家在当代的大规模发展需要一个成熟的或者至少部分成熟的知识经济。印度选择了这一途径，但将发现其不完善的高等教育是一个主要障碍。

高等教育的现状

印度在 21 世纪的知识竞争中具有相当优势。印度具有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其学生规模位居世界第 3，仅次于中国和美国。

印度主要用英语作为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的语言。印度具有悠久的学术传统，尊重学术自由。印度有一小部分高水平高校、院系和研究中心，可以成为高水平高等教育的基础。在印度，主要由各个邦而非中央政府对高等教育负责的情况，造成了印度高等教育结构笨重，但是这一结构也为实施各种政策和路径提供了可能。

然而，印度高等教育体系的弱点远远超过其优势。印度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约为 10%，仍然大大低于国际标准，主要工业国家已达 50% 以上，中国则是 15%。印度高等教育体系顶层的高水平院校特别少，其余大部分高校最多只是达到了一般水平。几乎世界上所有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都像一个金字塔，金字塔顶部为顶尖大学，底部是大量的一般性大学。但印度的顶尖大学非常少。没有一所大学在高等教育体系的顶部占有稳定的地位。少数最好的大学拥有若干卓越的院系和研究中心，还有一些杰出的本科生学院。大学拨款委员会（University Grants Commission）最近为 5 所大学提供了重要支持，加强这些学校已经被公认的优势，这一举措向承认高等教育体系的分化迈进了一步，鼓励追求卓越。当前，印度的世界一流高校主要局限在印度理工学院、印度管理学院，可能还有一小部分其他学校，如全印度医学科学院（All India Institute of Medical Science）、印度塔塔基础研究院（Tata Institute of Fundamental Research）。这些高等教育机构的在校生之和不到印度全部高等教育在校生总数的 1%。

除少数几所高校外，印度的大学和学院都已成为规模庞大、经费不足、管理不善的高等教育机构。在许多高校中，政治已介入校园生活，影响学校各个层面的学术任命和决策。对图书馆、信息技术、实验室和教室

等方面的投入不足,导致学校非常难以提供高水平的教学、开展前沿研究。

许多高校都出现了兼职教师人数增多和全职教师减少的情况,导致高校教师的士气和献身精神下滑。各层次问责制的缺失意味着很少对教学和科研活动进行评价。高等教育体系几乎没有任何激励措施鼓励卓越。官僚体制的惯性阻碍着变革。学生骚乱和教师偶尔的煽动有时会破坏学校的正常运作、延误考试以及制造紧张气氛。但是学校的管理者仍能提供教学、组织考试和授予学位,看起来像平常一样。

即使印度高等教育金字塔顶部数量极少的几所高校,目前也面临着严重的问题。迫使印度理工学院改变学校招生等政策的政治压力,已经危害到这些学校卓有成效的精英教育。许多在技术方面受过良好训练的印度理工学院的毕业生,都不选择在印度新兴的技术部门工作。大约有一半的学生一毕业就出国进一步深造,其中大部分人毕业后留在了国外。在美国获得科学和技术领域学位的印度籍学生,高达86%的人在刚毕业时不回国发展。还有一个重要的群体(大概占30%),决定放弃原先的科学和技术专业,转行在印度攻读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因为印度本土的工资更高。印度理工学院和印度管理学院有一批既敬业又能干的教师,但国外和私立部门工作的诱惑使得学校越来越难以吸引最优秀的人才加入教师队伍。

在印度,几乎没有人创造性地思考高等教育,也没有高等教育研究。而那些高等教育充满生机的国家都在收集相关数据,注重对本国的高校进行研究分析。印度还没有独立的高等教育研究或政策中心。政府和大学的领导者似乎对现状很满意。高等教育体系 and 高校现在已经变得规模庞大而复杂,需要完善的数据、谨慎的分析和创造性的想法。在中国,20多所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和若干所政府机构都在参与高等教育政策的制订工作。

创建顶尖大学的重要性

印度的高等教育几十年来表现得越来越

平庸。目前,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中,印度试图在需要受过良好培训的专业人员的领域展开竞争,因此高等教育的质量变得日益重要。到目前为止,印度规模庞大的受教育人口和大量至少基本上训练有素的大学毕业生使印度还能继续向前发展。但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因为其他国家正迅速提高其高等教育的质量,更新科研设备。尤其是中国,为了在未来10年中建成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建成更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研究型大学,对国内顶尖大学进行了重点投资。其他亚洲国家也以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为目标,加大了对高等教育实力的提升力度。作为IT硬件的主要设计者和生产者,中国台湾正在考虑将几所顶尖技术大学合并,建成一所“亚洲的麻省理工学院”。

为了在21世纪的知识经济中获胜,印度需要足够多的大学,这些大学不仅能培养优秀的出国深造的人才,而且能在一些科学和学术领域开展尖端研究,能为日益发展的经济至少提供必要的知识和技术。印度最近决定遵守世界贸易组织条例,停止生产普通的药物,体现了印度希望具有开发、生产和销售科技产品(包括药品)等独立科研能力的需求。

获得成功的途径

印度怎样建设一个高等教育体系以使其成为发达国家?高等教育中新出现的私立大学不能充当学术成长的先锋。几所条件良好、管理有效的私立高校具有较高的学术标准,尽管还不清楚这些机构是否能长久地持续发展。它们能在管理等领域培养出合格的毕业生,但它们不具备成为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的基础。这些私立高校既缺乏资源建设优质教育和科学研究所必需的设施,也不能通过提供主流的人文和科学教育而获得足够的经费。绝大多数私立高校不关注科学领域的研究生教育。

只有公立大学具有发展成为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的潜力。那些全国知名的高校和专业已被政府遴选出来,但并没有得到充足或持续的支持。顶尖大学需要获得公共经费持

续的支持；需要为学者提供丰厚的工资，以吸引优秀的科学家和学者；需要提供奖学金和助学金，以招收优秀的学生；需要建立以学术卓越为标准、通过竞争获得发展经费和科研经费的学术文化，建立一种包括有利于创造性科研的自治制度和有利于科研产出的问责制度在内的制度。世界一流大学需要世界一流的教授和学生，以及维持和激发世界一流大学的文化。

印度还没有建立显著分化的高等教育体系，即明确界定几所大学为精英大学，为其提供更多的资源。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如此优秀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加州的其他大学获得的支持少得多。印度的精英大学需要政府持续的支持，需要得到承认，承认它们是真正的顶尖大学，值得投入相应的资源。但它们也同样需要高效的管理和优秀的学术氛围。对那些不能高效管理资源的学校进行投资，意味着浪费资源。目前即使获得丰富的

经费资源，也缺乏建设和维持顶尖大学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需要一系列特殊的条件和资源：在问责和自治平衡的前提下提供持续的经费支持；建立分化的高等教育体系，各类高校（包括私立高校）具有不同的使命、资源和目的；进行管理改革，引进高效的管理；在教师聘任和晋升时真正贯彻学术卓越的标准，并以类似的卓越标准对学生进行严格而公开的招生、筛选和教学。

印度不可能一蹴而就地建成获得国际认可的研究型大学，但具有开始并维持这一过程的关键因素。印度需要建立十几所或更多的能参与国际竞争的大学，以便全面参与新的世界经济。没有这些大学，印度的科学技术肯定将继续停滞不前。

译者注：本文译自 Number 40, Summer 2005,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保持牛津大学的世界一流地位

David Palfreyman

英国牛津大学新学院 (New College) 财务主管和院务委员、高等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我们应坦诚地承认目前在牛津大学高级会议厅 (senior common room, SCR) 有隐藏着一些观点, 其中四个观点还处于边缘化状态, 另有一个观点得到许多支持。这五个观点是: “保持世界一流”、“提高学费”、“保护导师制”、“扩大入学机会”和“维护学术自治 (副标题为‘让疯子们负责精神病院’)”。由于篇幅原因, 本文将集中讨论前四个观点。

当然, 这些观点有重叠的地方, 本文所讨论的有关牛津大学的内容也适用于英国另一所名列世界“前 10 名”的剑桥大学, 就集中而昂贵的本科教学 (通过“监管制”而不是“导师制”)、花费不菲的科研活动 (剑桥大学有更多的“大科学”项目)、学生的社会经济背景 (上等人!) 等方面而言, 两所大学十分相似。本文的部分观点也适用于其他精英大学, 如伦敦大学学院、帝国理工学院、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曼彻斯特大学和爱丁堡大学。简言之, 如果我们想要维持这个赚钱的出口产业, 即“英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 (每年带来 30 亿英镑的 GDP 收入, 在英国高等教育带来 400 亿英镑的经济效益中处于前列), 这些旗舰大学必须获得足够的经费支持。整个英国高等教育的声誉依赖于这些精英大学一直保持成功。因此, 如果我们想避免其他主要欧洲国家高等教育体系走向平庸和灭亡的命运, 必须解决在高级会议厅中提出的几个问题。

保持世界一流

2004 年, 牛津大学高等教育政策研究中心 (Oxford Centre for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Studies) 和乌兰诺夫公司 (Ulanov Partnership) 在牛津大学的资助下, 采用全美高校经营管理者协会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llege and University Business Officers) 在“大学成本项目”中设计的方法进行了合作研究, 以便与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

校进行直接对比。该研究的核心观点是, 如果牛津大学希望维持其全球竞争力, 需要在每年 5 亿英镑的财政预算之外再增加 1.5 亿英镑的经费。由纳税人提供给英国本科教育的“经费数额”在 20 年左右的时间内减少了一半, 对牛津大学和其他大学来说, 即使在 2006 年把学费上涨到 3,000 英镑也远远不够, 而且也为时太晚。政府正加大对科研的投入, 但议会绝不可能在 2009-2010 年高等教育经费投入评估中将来自英国和欧盟的本科生学费上限提高到符合实际情况的 1 万英镑以上。这些额外收入, 加上牛津大学从校友那筹集到的经费以及通过开发和利用知识产权所获得的经费, 有可能让牛津跟上美国对手的步伐, 后者的经费目前是牛津的 3-4 倍。牛津大学的财政状况令人震惊, 既反映在牛津大学的教师在比美国同行报酬低、工作量多的情况下取得了值得称赞的学术成就, 也反映了学校目前在财政方面吃老本所存在的风险。

提高学费

任何有关提高学费的讨论都立即让人把富裕的中产阶级的狡猾自私与旧工党后排议员残留的社会主义想法以及 2004 年对《高等教育法案》的愤怒联系到一起, 该法案建议收取不高于 3,000 英镑的学费, 而且首相布莱尔在仅有 5 人投票赞成 (尽管理论上要求应获得 150 人中绝大部分人的同意) 的情况下就通过了该法案。工党成员经济学家德赛勋爵 (Lord Desai) 评价说: “35 年来我一直听到同样的争论: 如果我们什么都收费, 穷人将上不起学。中产阶级, 总是聪明地利用穷人来证明他们享用补助金的合法性……现在的情况是, 在收取较少的学费时, 我们必须分配名额。这种名额分配将导致低劣的教育……谁将接受低劣的教育? 是那些来自低

收入家庭和少数民族的学生……问题在于英国人民，尤其是其他地方的人民（英联邦）错误地将均等等同于平等……英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已使中产阶级成为国家福利的最大抢夺者。”

昂贵的学费加上给来自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家庭学生的大量助学金和教育贷款，建立了一个比预想的公正、自由的公共体系更公平的高等教育体系。根据社会公平原则和所提供的优质教育，牛津大学应向那些有经济支付能力的学生和家（他们中的许多人若就读私立学校将支付等量或更多的费用）每年收取1万英镑的学费。当然在收取学费的同时，牛津大学必须在招生时一点儿也不能考虑学生的经济状况，实行严格公正且方法有效的大学生助学金和贷款制度，以确保入学申请者不因经济原因而失去求学的机会。同时，通过严格的成本控制，扩大校友捐赠，合理利用低利率贷款，从科研活动获得全部管理费用，有效地运作学校捐赠，以及开展诸如会展、旅游等一切可能的营利活动来增加学校的收入，从而使每年的学费增长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而不像英国独立学校和美国私立大学那样疯狂增长）。

保护导师制

与英国和美国的许多精英大学不同，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仍然非常重视本科教学。值得关注的是，与学术型院系把重心主要放在科研上不同，牛津剑桥学院作为教学机构一直都非常注重保卫自己致力于教学的承诺，也与许多精英大学为追求科研的卓越而减少教学经费的做法形成了对比。在牛津大学，导师制正面临着压力：与其他高校师生比为1:12/15的讨论课相比，师生比为1:2的导师制需要更多的经费成本，也依赖于导师和学生的共同努力。牛津大学的导师制具有神秘而神圣的地位。但当牛津大学悄无声息地转变到“小组教学”时，导师制是否也成了过时的制度？成为学校口头上的神圣事物？导师制是否将作为教育精华、牛津大学皇冠上的明珠被不惜一切代价地保留下来，因为

这是挑战、鼓舞并真正培养年轻人具有通过通识教育掌握终身学习技能以及具有合理分析和批判思维能力的最好办法，有益于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要求学生完成比其他精英大学学生更多的书面作业，让他们有机会以在其他精英大学已经非常少见的方式讨论问题，这一要求所带来的额外价值是否值得并得到学生和未来雇主的充分认可？适量收取学费至少能检验学生或家长是否真正对密集型本科教育感兴趣。

结论

英国在金融服务（伦敦市）和高等教育（牛津和剑桥大学）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前者由于20世纪80年代实施的缩小国家对经济干预范围的改革而得以维持，而后者目前需要通过提高2010年之后的学费上限（如果没有最高值）而加以改革。随着其他收入的增多，学费上涨将能使牛津大学紧跟世界竞争对手的步伐。在维持学术自治的同时采取上述措施是有益的；如果牛津大学由于成为一个公司主义者和管理主义者而自我伤害，采取上述措施将是一种浪费。欧洲另一个主要国家德国现在正通过授予高校更多的自主权、收取学费、为10所精英大学提供与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美国的常春藤大学展开竞争所需的经费等措施改革高等教育，如果牛津大学的卓越不能继续保持的话，将是一件憾事。世界一流大学之间的竞争不会有任何减少（特别是在中国大学快速发展的情况下），其生存的机会在于尽可能地摆脱政府对收取学费的干预，然而反过来也要求牛津大学继续保持开放与公平。

作者注：本文是作者在Hugo de Bergh、Jeremy Black和Anna F. Fazackerley主编的“Can the Prizes Still Glitter: The Future of British Universities in the Changing World(2007)”一书中所撰写章节的删节版。详见www.agora-education.org。

译者注：本文译自Number 49, Fall 2007,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世界一流大学：一所拉丁美洲私立大学的追求

Pedro Rosso, Nicolás Velasco

Pedro Rosso: 智利天主教大学校长; 电子邮箱: rectoria@puc.cl

Nicolás Velasco: 智利天主教大学长期规划委员会负责人

在竞争力越来越依赖知识创造能力的国际大背景下, 拉丁美洲的国家正面临着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新挑战。研究型大学应该在这一进程中发挥关键作用。但不幸的是, 该地区几乎没有研究型大学, 绝大部分都是面临经费不足、管理不善、政治不和的大型公立高校。私立研究型大学更是寥寥无几, 只有智利天主教大学 (Pontificia Universidad Católica de Chile) 在国际上获得一定的认可。天主教大学 1888 年建于智利首都圣地亚哥, 是智利最重要的私立大学, 目前它正在为实现 2038 年 (建校 150 周年时) 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而努力奋斗。提出这一目标是因为确信在诸如智利这样的具有发展潜力的小国家, 世界一流大学的作用巨大。

所面临的挑战

天主教大学的长期目标有多大的现实性? 天主教大学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具有治理良好、政策稳定的历史, 其质量和创新文化能够促进组织结构和教学课程不断改革。天主教大学还在许多领域有突出的表现。例如, 天主教大学在《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2005 年的世界人文和艺术学科排名中位居第 48 名。尽管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天主教大学在其他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努力, 主要是在科学、技术和研究生教育领域。但学校正在出现振奋人心的进步。根据美国汤姆逊科技公司的“基本科学指标”(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 天主教大学目前在拉丁美洲大学中排第 6 名。尽管这反映了天主教大学在论文发表方面的努力和发展潜力, 但由于拉丁美洲所发表的论文还不到世界科学论文总数的 2%, 因此从国际标准来看这不能算是个巨大的成绩。

在追求卓越的过程中, 天主教大学没有采取其他新的战略, 只是在学术发展的传统领域做到尽可能优秀, 包括招聘最优秀的教师、吸引顶尖的学生、提高教育质量、促进科学研究、建立与工业界的联系以及努力增加经费并使经费来源多样化。此外, 为了监测学校长期目标的实现过程, 天主教大学定期对一些关键指标进行评估, 如生师比、论文引文数、留学生的比例、毕业生的“市场价值”等。

教师和学生

在过去的 20 年, 天主教大学对师资队伍的发展进行了重点投资, 将大部分年轻教师都派送到美国和欧洲的顶尖大学去攻读研究生学位。就医学院而言, 这一政策所带来的结果是, 90% 的教师获得了海外研究生学位或在海外接受了博士教育。尽管从该地区的标准来看, 这一比例很不错, 但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除质量外, 天主教大学面临的主要挑战是需要增加一倍的全职教师, 目前有 1,066 人。因为天主教大学在许多学科都缺少教师, 且教师们目前的工作量不利于科研成果的产出, 这项任务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和巨大精力。

天主教大学在吸引顶尖学生方面非常成功。今年, 55% 在全国大学入学考试中获得最高分的高中毕业生被天主教大学录取。在一个拥有 63 所公立和私立大学的国家, 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成绩, 高水平的教师和学生是学校现在和未来发展的宝贵财富。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 天主教大学只接受那些成绩在班级前 30% 的外国交换学生。去年, 有 1,000 名来自美国和欧洲大学的本科生满足这一条件, 在天主教大学进行了两学期的学

习。

一项新的教育方式

天主教大学正在进行重要的课程改革，旨在为学生提供更加灵活、综合、有用的教育经历。课程改革包括：新的通识教育课程、强制性的英语学习课程、西班牙语写作课程以及社区服务学习机会。学校还提供广泛的课外活动供学生选择，包括教会活动、社区事务、体育和艺术。此外，学校培训教师们掌握创新的教学法，并且正在建设提供先进的信息技术教育工具的教学中心。

为了对各教学专业的质量进行检测，天主教大学聘请了美国和英国的质量认证组织对其本科教育进行评估。到目前为止，新闻、建筑、医学和工程学院已成功地通过评估。

加强科研能力和研究生教育

加强科研能力是天主教大学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智利缺乏学术传统，公共投入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0.6%，来自私有部门的支持更是微乎其微。但这一情况可能会大有好转，因为即将颁布的法律将在科学和技术领域实行新的税收政策。考虑到智利工业领域的创新能力有限，智利政府提高对基础科学研究投入的同时，正在努力推动大学和工业界联合开展研究项目。这一充满希望的新环境对天主教大学是非常有利的，让学校能够获得额外的经费雇佣具有科研潜力的新教师、改善实验室和其他设施的设备。

另一个对天主教大学非常关键的目标是扩大研究生教育的规模并改善其质量。智利急需更多具有博士学位的人才。与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相比，智利大学每年授予的博士学位数量令人沮丧。例如，2004年智利全国总共仅授予了240个博士学位。由于这一原因，天主教大学过去的5年将发展博士教育作为最重要的工作，博士生授予数从270人增长到550人。2004年，天主教大学授予的博士学位数第一次超过50人，这一数字今年可能将继续增加。学校计划到2015年达到每年毕业200多名博士。

捐赠收益和经费

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需要大量经费。天主教大学不是一所富有的大学，其所在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7,000美元。尽管面临这些不足，经费并不是一个不能克服的障碍。今年，天主教大学的总经费预算达到5亿美元，包括学校控制的各种商业和投资。与大多数美国研究型大学的经费预算相比，这一数目并不大，但未来应该会大幅度增长。智利的经济近20年来一直都在健康发展，而且未来的发展前景良好。大学将大大地受益于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由于收取学费、政府资助的增加和政府提供竞争性经费能力的大幅度提高，天主教大学的经费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增加了1倍。

与美国私立研究型大学相比，天主教大学获得的捐赠数额仍然很少。学校目前拥有2亿美元的捐赠，包括大学拥有并投入使用的电视网络设备。学校应该大量增加捐赠，以便获得大量额外的收益。目前，为了增加投资收益，学校的许多资产，其中绝大部分是没有产出的固定资产，正被用来重新投资。

结论

将拉丁美洲地区的一所私立研究型大学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充满挑战但非常吸引人的任务。不管最终结果如何，2038年的天主教大学将处于一个比常规发展速度所能达到的状况更好的发展位置。

智利现在能够负担得起一所研究型大学，天主教大学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就处在这一最好的发展环境中。拉丁美洲地区正受到政治领导者领导不力和对不公平的经济改革没有清醒意识的双重夹击之中，但智利正逐渐成为该地区唯一一个社会和经济不断发展的国家。智利期望达到更高的发展阶段的梦想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接近现实，建成一所研究型大学（如天主教大学）能够有利于这一梦想的实现。

译者注：本文译自 Number 43, Spring 2006,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研究型大学与其校长的关系

Amanda Goodall

英国华威大学华威商学院

电子邮箱: Amanda@amandagoodall.com

多年以来,许多国家都在思考有关大学校长的问题:研究型大学的校长是否应该由优秀的学者担任?鉴于学术研究在大学职能中的重要性,这似乎理所当然。另一个在英国讨论的特别激烈的问题是,大学校长是否必须是一个优秀的管理者?从北京到布达佩斯的校长遴选委员会都一直在努力解决这些问题。

新的研究表明,由优秀的学者担任校长的大学将表现得更出色。同样,由学术能力不强的学者担任校长的大学,其水平将下降到平均水平。因此,在校长的学术能力和大学未来的发展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这种因果关系需要通过纵向研究证明,而不能仅仅通过简单的现状研究证明。

笔者在早期的《世界百强大学的校长》(Number 42, Winter 2006,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一文中指出,大学校长所发表论文的引用情况与大学在世界大学排名中的位置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性。换句话说,顶尖大学由更优秀的学者领导。笔者后续的研究主要关注商学院的院长,发现商学院在《金融时报》“全球商学院排名”中的位置与其院长的总引用情况具有显著相关性。

纵向研究

笔者最近对英国55所研究型大学9年的发展情况进行了研究,主要关注了因果关系。通过收集到的纵向数据,该研究试图超越简单的现状研究。本研究运用回归分析,将大学的发展作为因变量,大学校长所发表论文的引用情况作为关键自变量。同时对大学的收入、大学校长的年龄、大学校长的学科领域进行输入量控制。

本研究利用了英国自1986年建立的科

研水平评估(RAE)的结果。与大学排名不同,科研水平评估以一个更为客观的同行评价体系为基础,对所有学科的科研质量进行评价。本研究的数据来自55所大学,即1992、1996和2001年参与科研水平评估的高校。

样本包括165名英国大学的校长,他们在大约20年的时间内担任这55所大学的校长。本研究主要关注大学校长所发表论文的引用情况,根据学科对引用情况进行了标准化处理,以此反映每个校长过去的学术产出情况。

因果联系的证据

纵向研究的结果表明,在大学校长的学术能力和大学的未来发展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因此,在这9年中,那些由更加优秀的学者担任校长的大学在科研水平评估中的表现更出色。数据显示,表现最好的大学大部分都是由论文引用率较高的学者担任校长。就55所样本大学的总体情况而言,水平提高最大的10%的大学中,其校长的论文引用率是那些水平提高最小的10%大学校长的4.5倍。

学术还是管理?

学术能力并不必然代表管理经验和领导技能。本研究中的165个大学校长,绝大多数人在担任大学校长之前是副校长或重要研究中心和实验室的负责人。可能有人会提出疑问:管理能力比学术能力更重要吗?

本研究还访谈了英国和美国研究型大学的23个校长。绝大部分校长认为领导能力就是确定学校的整体发展方向,规划学校发展战略的具体实施方案。更为有趣的是,被访谈的校长都认为校长负责制定大学的战略,

尽管他们承认战略制定之后还需要咨询其他人。

英国大学校长在不断努力让决策制定集权化，像美国常见的模式那样。许多大学校长认为大学委员会的决策制定过程既没有效率也难以实现。他们还普遍表达了对不能任命最高管理团队成员的不满。副校长、院长甚至系主任传统上都是由学术委员会（有时人数高达 100）任命的。绝大部分被访谈的校长都成功地改变了其大学内任命最高管理团队成员的过程，使校长拥有更多的任命权。

尽管大部分校长认为校长具有一些管理经历是非常必要的，但他们非常清楚，如有必要，可以聘请许多领域的管理专家。

为什么学术能力重要？

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所处的环境，即领导一所大学是否与领导其他组织有很大的不同？本研究中的 165 位校长，只有 8 人没有学术生涯。为了解释英国研究型大学领导者的标准，大学校长们指出了三个主要方面。第一，从同行那里获得认可和尊重的重要性。这意味着一个优秀的学者将更可信，能够提

高校长的影响力。第二，校长应成为质量的仲裁者，即确定大学的学术标准。因此，用某位校长的话讲“标准的执行者首先要符合标准”。最后，校长需要全面了解大学的事务和文化，被调查者认为没有学术经历或对那些放弃学术研究长达 10 年之久的人来说这一能力是很难获得的。这意味着学者的经历能使校长很好地理解其他学者的需求。

结论

笔者早期的研究表明，顶尖大学和商学院是由顶尖学者领导的。最近的纵向研究表明，在大学校长先前的学术成就与大学未来的发展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这意味着，研究型大学由管理者担任校长是不够的，大学是一个需要校长从学术界内部的专家中产生的组织。校长需要什么样的学术水平最终可能取决于大学的发展目标。

作者注：欲获得更详细的研究结果可与作者联系。

译者注：本文译自 Number 45, Fall 2006,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发展中国家的大学应停止研发吗？

Armando Alcantara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 (Universidad Nacional Autonoma de Mexico) 教授

电子邮箱: Armando.alcantara@bc.edu

当我们目睹许多发达国家进入知识社会时，发展中国家在努力赶上发达国家时遇到的困难似乎难以克服。工业化国家的研究型大学与其他公立和私立高校一起，继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开发着技术产品。因此，全世界目前正目睹着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如何日益加大。当美国、日本以及西欧等工业化国家将其国民生产总值的 2-3% 投资于研发时，发展中国家则很少能达到 1%。在发达国家，产业与大学研发之间的密切联系，使得科学和技术研究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工具。然而发展中国家大学的研发工作通常缺乏来自本土企业的有效需求，基本上都是面向学术界的。当大学的科研不能为解决本国紧迫的社会需求做出重要贡献时，尤其令人烦恼。

第三世界的一些国家正试图模仿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成功经验，这四个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证明，凭借本国的研发能力实现经济增长是可能的。但如果不采取一种创新的方式来实现政府、大学和本国企业之间的合作，要想获得成功是不可能的。因此，发展中国家研发活动的生存能力已成为学者、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日益关注的问题。

拉丁美洲，尤其是阿根廷和墨西哥就能说明发展中国家的研发现状。拉丁美洲的知识产出在世界科技产出中所占的比例不到 3%。考虑到其低水平的研发投入，出现这一结果是不足为奇的。所有拉丁美洲国家的公共研发经费仅相当于一些跨国公司的研发投入。作为拉丁美洲地区具有研发传统和研发人员的国家，阿根廷和墨西哥（再加上巴西）的研发投入依然相当低（不到国民生产总值的 0.5%），从事研发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人数也很少（大约在 1.4 万到 1.65 万人之间），

而这一数字在工业化国家超过 5 万。另一些指标显示，阿根廷和墨西哥绝大部分的研发经费来自于公共经费（80% 以上）。几乎没有以科学研究为职业生涯目标的博士生。因此，由于资源非常有限、研发人员很少，当用授予本国居民和非本国居民的专利数来衡量时，结果毫无意义。与这个指标相关的是，专利和许可的使用费远远高于从专利和许可获得的收入。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阿根廷和墨西哥的研发活动主要集中在大型公立大学。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 (University of Buenos Aires)、墨西哥的国立自治大学以及巴西的圣保罗大学 (University of Sao Paulo) 和坎皮纳斯州立大学 (University of Campinas) 是拉丁美洲从事科学研究最著名的大学。尽管具有最古老的科研传统、聘用着最多的科学家（其中许多人非常杰出），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和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学校规模太大（在校生都接近或超过 20 万），又因为预算吃紧、太过官僚、过度政治化、与当地工业缺乏联系等问题备受困扰。与大多数拉丁美洲的高校一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和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都具有很强的专业导向，可以从其工学院、医学院、法学院、会计学院、哲学与文学学院发现这一特点。在绝大多数学院中，研发活动仅仅处于边缘。

由于上面所列举的这些大学所遇到的问题以及本国研发在解决社会需求方面所发挥的微弱作用，发展中国家的大学是否应停止研发的问题随之产生。当然不能对这一两难问题做出简单的回答，因为知识的创造和传播仍是现代大学的主要职能之一。而且，许多大型公立大学由于多年的积累而具有重要的科研设施和设备。一些大学还雇佣了许多科学家和技术专家，这些科学家和技术专家

的培养（通常在工业国家的知名大学获得学位）意味着时间和金钱的大量投资。所有这些资源都不能浪费掉。有两种方法可以使本国的研发发挥重要的作用。第一种方法是，本国的研发应重点关注特定市场的创建与巩固，这样许多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可以集中于某一具体领域并在这些领域形成高度的竞争优势。第二种方法是，研发工作必须能解决本国社会的迫切需求，如卫生、能源、食物、教育和污染等。

当前的全球化进程、交流和信息技术的日益便捷是否能帮助发展中国家克服大学研发工作一直以来不能解决社会需求的困境，

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技术将加大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现有差距是非常可能的。在当前不稳定的知识竞赛中处于落后地位所带来的风险将比过去更真实，因为信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往返于世界的多个地方。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者和技术专家应充分利用通信网络来维持和改善与世界主要研发地区的交流，从而避免被边缘化乃至被排除在外的危险。

译者注：本文译自 Number 22, Winter 2001,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拉丁美洲的研究生教育：新时代的来临

Jorge Balán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社会科学研究中心（Centro de Estudios de Estado y Sociedad in Buenos Aires）研究员、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研究院客座教授

电子邮箱：j.balan@cedes.org

拉丁美洲很早就建立了以科研为基础、以学术为导向的研究生教育。20世纪50-60年代，该地区许多国家都建立了为科学研究和研究生教育提供支持的国家委员会。在那一时期，名牌公立大学试图通过建立高水平的研究生教育和科研来扩大、更新教师队伍。自80年代中期以来，该地区的民主政府提供了更多的合法性和更慷慨的经费支持，以扩大教育和科研的规模与领域。公立大学的研究生教育获得了更多的学术和管理自主权。

在学校的密切监控下，研究生教育现已成为高等教育中最具活力和创新性的部分。面对高等教育和其他经济部门对人才的需求以及大量本科毕业生的就业需求，研究生教育市场正在逐渐扩大并多元化。政府通过监管、激励措施以及为研发活动提供经费支持等方式，在促进研究生教育的发展上发挥了关键作用。本文对拉丁美洲几个主要国家的学术型研究生教育专业进行了探讨。

定位、规模和经费

1985年，巴西制定了一个选送1万名学生出国深造的计划。但在20世纪90年代，发展国内各知识领域的科研和教育能力的计划获得了优先地位。今天，巴西已成为拉丁美洲地区研究生教育的领头羊，学术型研究生达10万名，其中博士生占38%。与15年前相比，科研成果增长了2.5倍，其中85%来自于大学的科研和研究生教育。墨西哥也有数目庞大的研究生，但构成非常不同：2005年的硕士研究生规模为10万名，是1990年的5倍，但博士生只有1.3万名。阿根廷名列第三，有2.5万名硕士生和8,000名博士生。作为一个小国，智利目前有1.3万名硕士生和3,000名博士生。哥伦比亚排在最后，硕

士生不超过1.2万名、博士生不超过1,000名（直到最近，哥伦比亚的研究生主要集中在专业教育领域）。在所有这些国家，这些数字与通过国家机构认可的认证专业相一致，国家机构通过同行评议确定相关的认证标准。各国的认证标准不一，巴西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发展质量保证体系，如今该体系已经成熟且标准最高。五个国家的总人口接近3.7亿，截至2005年，共提供数以百计的博士专业，每年授予1万多个博士学位。

与中国、韩国和印度相比，20世纪80和90年代的拉丁美洲并不十分依靠其他国家的博士生教育，而是在先前投资的基础上扩大国内的博士生教育。拉丁美洲学生目前在美获得的博士学位少于亚洲学生。此外，拉丁美洲往往聘用本地区培养的博士生。与亚洲留学生相比，在美获得博士学位的巴西和墨西哥学生打算回国工作的比例更高。

博士生教育主要集中在公立大学，几乎都由教育和科研方面的公共经费支持。尽管许多私立大学在非常普遍的社会和人文学科的硕士生教育方面很有竞争力，但基本上（除少数外）都缺乏理科和工科博士生教育所需的科研基础设施。自从该地区恢复了民主体制之后，尽管采取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经常性的国家财政危机和同样频繁的公立大学管理危机并没有阻碍研究生的培养和规模增长。公共科研经费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数量都获得了增长。巴西现在将国民生产总值的1%投入研发活动，20世纪90年代这一比例仅为0.7%；阿根廷和智利投入研发的经费比例虽然较低，但在经济迅速增长时期也有较大增幅。尽管在世界科学领域仍是配角，但拉丁美洲在世界科学知识生产中的相关比重在过去15年翻了一番。企业在科研的

经费投入和实施方面发挥的作用有限，雇员中基本没有博士。但具有研究能力的公立大学开展了技术转移，许多由公共部门提供支持的企业合作项目被证明是成功的。

公立巨型大学的科研和研究生教育

尽管美国加州高等教育的三层模式经常出现在拉丁美洲大学改革者的头脑中，但该地区既没有研究型大学的理念也没有设置研究生院。然而，科研和研究生教育在专业学院和专业型本科教育占主导地位的传统巨型大学中还是获得了良好的发展空间。

政府制定了重要的激励措施鼓励大学发展和支持研究生教育。在有些国家，高校为了获得大学这一地位，进而获得自治权，需要提供大量研究型研究生教育项目。获得研究生学位是成为大学教师的必要条件，也可以提高现有教师的工资待遇，因而，甚至在以前那些只要求教师具有专业学位（如工程、法律、医学）的职业学院也出现了对研究生教育的需求。为了加强公立大学的科研和研究生教育，各国政府都努力从世界银行和泛美开发银行争取贷款。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对研究生专业进行认证越来越普遍，这意味着对质量保证投入更多精力。同行评议在认证体系和竞争性科研经费中具有重要作用，提高了以学科为基础的学术组织在大学事务中的发言权。

拉丁美洲的大学改革，成功地将本科专业教育的年限缩短为 4-5 年。研究生数量的逐渐增加带来了对专业型研究生文凭和学位的更多需求，专业型研究生教育也是由从事学术型硕士和博士学位教育的机构和教师提供的。受市场驱动的专业型研究生教育为从事研究生教育的教师提供了一些机遇和新的资金，也因而巩固了他们在大学里的地位。权力下放、管理自主权以及大学多元化筹资的压力非常有利于研究生教育和研究生导师。研究生导师的工资可能会由大学之外的科研机构或特定的资助项目支付或补充。占主体地位的竞争性科研经费绝大部分来自公共机构。研究生教育可能会收取学费，实际上许多专业型本科和硕士生教育都是自给自

足的。研究生教育经费来源的多样化增加了管理的自主权，合同的制定和工作场所的规定更加灵活。因此，与过去公立大学中专业教育占主导地位的情况相比，研究生教育为全日制的科研型教师提供了一个更加安全有利的环境。不利的方面是这一安全有利的环境经常与大学生活的其他方面脱离，除了在那些受市场驱动的专业中。最后，研究生教育的发展与教师们对学术地位、职业倾向和学术价值观的看法日益不同有关。过去，学术型教师一般都是那些有外国留学经历、国际化且获得公立大学终身教职的一小部分学者，但现在国内培养的教师已成为重要部分（尽管并不占主导地位），研究生教育的教师多半是这种情况。

结论

像其他地方的一样，尽管科研和研究生教育无疑是拉丁美洲高等教育中国际化程度最高的部分，但由于学术共同体的规模相对较少，且本国培养的研究人员占相当大的比例，以及教师流动受到研究型大学不仅数量有限且更倾向于招收其自己培养的博士毕业生的限制，狭隘主义和近亲繁殖的危险未能避免。对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国内出版物的依赖，尤其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也是一个好坏掺半的事情。由于这一地区在国外受过训练的研究人员日益减少，基金会、研究型大学和学术界积极探索了多种替代方法来解决这一发展趋势带来的风险。通过国际合作撰写学术著作在一些国家和学科迅速发展。在质量保证方面，国际同行参与并经常得到国际组织支持的合作非常多，且富有成效。在电子传媒的支持下，许多科研和研究生教育方面的合作得以开展，是昂贵的学术交流项目的有益补充。为博士生提供在海外的实验室和机构完成学术论文所需奖学金的做法越来越普遍。国际化已成为优先发展的方面，但当国际捐赠机构找不到非常有说服力的理由为拉丁美洲国家提供帮助时，国际化将不得不与其他事项竞争国内经费。

译者注：本文译自 Number 50, Winter 2008,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高等教育大众化与超级研究型大学

David P. Baker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教育政策研究系教授

电子邮箱: dpb4@psu.edu

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正同时经历着两个重大转变。许多有关这两个转变的学术文章和新闻报道认为这两个转变是完全相反的,在大学内引发的冲突多于和谐。第一个转变通常被认为很平常,即许多国家(不仅在美国等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空前扩张和大众化。这一扩张发生在过去 60 年里初等和中等学校入学率迅速增长的教育改革之后。第二个趋势是“超级研究型大学”(super research university)的出现和兴起,主要是在美国,但已逐渐成为世界各国许多研究型大学追求的一种模式。

与认为这两种趋势互相冲突的一般假设相反,这两种趋势从根本上来讲是共生的,以至于缺少其一则另一趋势也不会发生。最近有关教育扩张和超级研究型大学发展的分析显示,大众接受并完成高等教育是规模更大、经济更富裕的高等教育体系(包括昂贵的超级研究型大学)获得更多社会资助的原因所在。

高等教育大众化

就在几十年前当富裕国家刚刚完成中等教育扩张时,许多专家曾预言高等教育的过度扩张可能会导致社会危机后停止。然而,高等教育依然持续快速扩张。例如在美国,高等教育入学率每 10 年都有明显的增长。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最近公布,高中毕业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从 1972 年的 49% 增长到 2005 年的 69%;从 1989 到 2004 年,获得文科学士学位和理科博士学位的学生比例分别增长了 33% 和 46%。世界其他国家甚至出现了速度更快的增长,当前 25% 左右的青年人可以接受高等教育,自 20 世纪中叶以来提高了近 9 倍。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让每个人终身都接受教育是一个真正具有革命性的理念,为我们人类的思考、工作和生活方式带来了巨大影响。这一理念已深深地扎根到现代文化中,以至于过去经常被认为是幻想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在世界各国迅速蔓延。

美国超级研究型大学

过去几十年美国超级研究型大学的出现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教育发展。这一数目虽小但增长迅速的超级研究型大学能带来科技前所未有的发展以及规模空前的有关人类社会的知识。尽管需要非常昂贵的建设和发展资金,超级研究型大学依旧在美国继续发展并增加。但是,包括德国在内的其他一些发达国家即使创建一所这样的超级研究型大学都有困难。

美国超级研究型大学的模式已经引起许多其他国家的关注。根据该模式,政策制定者认为仿造超级研究型大学所需要的资源包括教师的工作条件、竞争性的政府科研资助、庞大的私有部门等等。然而,经常被忽视的是美国为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提供的巨大社会支持。美国已实现了这一模式,首要原因是具有一个综合性的中等教育体系,培养有继续学习渴望和期望的高中毕业生;其次是具有一个相对开放和综合的高等教育体系。这使美国社会认为,大学尤其是高等教育体系中的超级研究型大学并不是只有精英或少数人才能享受的机构,而是一个非常民主和实用的教育机构。许多美国人接受高等教育,并且与美国各种类型的高校关系深厚,这一现实使超级研究型大学获得了更广泛的社会资助,即使只有少数一部分美国人进入超级研究型大学接受高等教育。

超级研究型大学模式是昂贵的，需要国家非常富裕。在美国，私人资助提供了巨大的资金。许多超级研究型大学都是私立的。尽管这些因素促进了超级研究型大学模式的发展，但它们并不是根本原因。相反，超级研究型大学的根源与美国社会如何为高等教育（包括精英研究型大学）提供广泛的社会支持有关。换句话说，美国的正规教育为高

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奠定了早期的基础，并提供了必须具备的所有条件。美国的个案研究表明，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超级研究型大学实际上是相互支持的，而不是相互排斥的零和博弈。

译者注：本文译自 Number 49, Fall 2007,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最新改革浪潮中的日本国立大学

Martin Finkelstein

美国西东大学 (Seton Hall University) 教育学教授

电子邮箱: finkelma@shu.edu.cn

日本国立大学的基础将要被自二战盟军占领后规模最大的“新”改革措施所动摇了, 动摇的程度可大可小, 取决于你向谁问这个问题。由于确信日本未来经济复苏的关键在于国立大学建立世界一流的研发基础设施, 文部省已同时开展两个重大的改革措施, 以便在高等教育体系中引进竞争性市场机制:

(1) 授权国立大学进行法人化改革并设立学校董事会, 成为独立于 (至少在理论上) 文部省的公共机构; (2) 授权并激励所有公立大学的学术单位进行教师聘用改革, 从终身教职体系转变到有固定聘期的合同制。这两项改革都被广泛地认为 (虽然没有那么明显地说出来) 是开始了日本高等教育体系“美国化”的新时期。

2002-2003 学年, 我作为客座教授在日本最“重要的”国立大学——广岛大学工作了 7 个月, 亲眼目睹了这一转变。

改革前

对那些不熟悉日本教育高等教育体系的人, 我首先介绍一下它的基本情况。日本的高等教育体系在组织方式上更像欧洲大陆 (尤其是德国) 的而不是美国的。它是一个典型的官僚体制, 高等教育体系内部各学术单位的自主管理使其充满活力。文部省直接与国立大学各校区的学术单位联系, 即学院 (主要关注本科生教育)、研究生院、研究院和中心。这些学术单位相对独立于大学的管理, 就像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美国的大学管理那样, 学校只设置最低限度的管理体系, 没有全能的校长 (在日本, 大学校长就像统率着一群由效忠国王的军阀组成的“松散”联盟的头领那样, 有名无实; 文部省的官员则是国王)。这些学术单位在文部省的规章制度

框架下自主管理, 这种管理模式由相关学术单位的领导负责实施, 这些人就相当于文部省的眼睛和耳朵。

在过去的十年中, 日本国立大学再次把精力集中在建设世界一流的研究、科学和技术中心。因此从组织的角度来看, 过去十年的主要发展是国立大学自治学术单位的激增 (规模不大), 尤其是研究单位 (各种研究院或中心, 每个学科都至少增加了几个这样的机构) 和研究生院。与许多其他国家不同, 日本公立大学并没有被要求承担扩大入学机会以使适龄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主要任务。在日本, 最近 30 年发展起来的规模庞大、增长迅速的私立高等教育承担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任务。目前, 日本的国立大学是 99 所, 而私立高校则有 500 所。当高等教育入学人数在未来十年急剧下降时, 最先受到冲击的将是私立高校。国立大学能够继续追求科研卓越的国家目标, 而较少受到市场力量的影响。

至少在公立高校, 担任日本大学的教师是世界上最好的职业, 既不受市场力量的影响, 又能获得特别连贯的经费支持。终身教职是教师聘用 (任命) 的一个基本条件, 公立高校几乎没有压力。某种程度上, 这是日本所有社会机构的运行方式——以各自的方式生活而较少受到变化着的外部环境的影响, 这也被认为是大学鲜明的本质特征。而且, 这也是日本这个谜一样的国家的一个鲜明特征, 既相对与世隔绝, 也存在长久以来为吸引外国学者到日本和送日本学者出国留学而提供丰厚政府资助的项目。

改革后或改革中

日本的高等教育将模仿美国的高等教育

到什么程度？刚刚法人化的高校将在多大程度上“独立于”文部省？谁将成为校董事会董事以及如何遴选？公立大学是否将出现新型的校长，像美国大学的威廉·瑞尼·哈泼斯（William Rainey Harpers）和尼可拉斯·穆雷·巴特勒（Nicholas Murray Butler），或者当今美国研究型大学的CEO？法人化是否将导致日本大学出现大量管理层级（尽管现在还不易察觉），与传统教学人员在学术决策制定过程中互相较量？根据绩效划拨经费、非终身教职制度和其他市场机制等的引进，是否会提高教师的流动性和科研产出？抑或它将导致在美国和澳大利亚出现的教师“聘用随机化”（casualization），以及教师们的职能日益专门化（仅仅教书、仅做研究或仅管理项目）？对那些将带领日本高等教育走向世界一流的新一代学者来讲，学术生活是否彻底发生改变？终身教职（或非终身教职）改革将完成到什么程度，或者被教师成功抵制？

如果非终身教职改革成功实施，合同制是否比终身教职更有助于教师的流动和科研产出的提高？如果我们认真考量一下哈佛大学教师聘用计划（Harvard Project on Faculty Appointment）的结果，参见理查德·查依特（Richard Chait）的著作《终身教职的问题》（The Questions of Tenure），就会有矛盾的结论。这些美国的形式是否会改变日本的学术文化，或仅仅是影响日本高等教育自治管理的一个外壳？竞争能否渗透进入这个本身没有竞争性且充满官僚主义色彩的文化中？

对日本的学者来说，这是个动荡的年代。老一代学者在惶恐不安中应对这些改革，这可能是半个世纪以来的第一次。新一代学者仍旧保持着沉默，比以前更加努力地工作，感叹着天堂的失去。

译者注：本文译自 Number 33, Fall 2003,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处于十字路口的韩国国立大学

Toru Umakoshi

日本名古屋大学 (Nagoya University) 高等教育研究中心教授、主任

自 1997-98 年经济危机以来, 韩国高等教育改革一直强调加强国际竞争力。“智慧韩国 21 项目”(BK-21) 是韩国教育部采取的第一个措施。第二个措施是 1999 年 7 月发布的《国立大学发展计划》报告, 重新审视了韩国国立大学的作用和功能, 以便提高国立大学的学术产出、促进其人力资源开发, 并极力鼓励占韩国 4 年制大学和学院 23% 的 44 所国立大学在这一报告的指导下进行重建。

大学分类

根据国立大学的作用和功能, 该报告将国立大学分为四种类型: (1) 研究型大学; (2) 教学型大学; (3) 专科学院, 比如从事海洋工程、教师教育和体育教育的高校; (4) 满足当地商业和工业发展需求的职业学院。韩国政府可能根据每所学校的具体目标提供财政经费。私立学院和大学竞争额外的经费。撰写该报告的专家组提出的另一个重要建议是改善高校的地理分布, 强烈要求合并或取消每个区域内 (共 7 个区域) 具有相似学院的国立大学或学院。

自治和独立

该报告还建议重组国立大学的管理体制。在当前的管理体制下, 国立大学受教育部的直接控制。该报告鼓励国立大学成为独立于教育部的“自治机构”。倘若大学校长是由教育部主持的遴选委员会通过一个公开招聘程序任命的, 当国立大学决定成为一所“自治机构”时, 那么教育部长和大学校长之间就签订一份管理合约。

在新的管理体制下, 大学校长独立于教育部, 自己负责学校的管理、人事和经费等所有事务。校长还可以自由地确定收取学费的计算公式。因此, 每所国立大学都必须建

立一个由大学内外的博学人士组成的“大学理事会”, 作为大学的决策机构。作为大学管理体制重组的一部分, 职员数目将被减少, 但教职员的培训将被加强。

改善教学和科研

该报告中提到的另一方面改革是加强对教学和科研活动的质量控制。大力鼓励国立大学引进新的激励措施, 如合同制、年薪制、给予优秀教师和研究者额外奖励等等。该报告还建议通过建立大学评价委员会来改革当前由韩国大学教育理事会 (Korean Council for University Education)、教育部和韩国教育发展研究所共同运作的大学评价体系, 将不同的大学和学科评价办法整合为一个标准化体系。

7 月份召开该报告的公共听证会后, 教育部将相关人士提出的意见整合进了最终版本。改革将分三个阶段进行: (1) 短期 (2000-2002 年); (2) 中期 (2003-2005 年); (3) 长期 (2006-2010 年)。教育部期望诸如引进大学理事会和大学评价委员会等短期改革事项将被及时纳入 2001 年的政府预算。

来自教授的评论

全国大学教授协会中来自国立、地方和私立学院与大学的教授对该报告提出了批评, 要求教育部撤销该报告。根据相关新闻报道, 许多教授批评该报告意味着大学民主管理的倒退, 这种民主管理是在民选政府过去 7 年执政的过程中实现的。国立大学的重组计划, 让作者想起了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朴正熙 (Park Chung-Hee) 总统执政时期痛苦的失败经历。

译者注: 本文译自 Number 21, Fall 2000,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俄罗斯研究型大学的理念

Anna Smolentseva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教育研究院研究员

电子邮箱: asmolentseva@yahoo.com

像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俄罗斯也在讨论研究型大学的概念、标准和功能。总体上讲,俄罗斯创建研究型大学存在三个主要障碍:第一,从历史上看,高等教育并不是知识生产的主要来源;第二,政府削减科研经费(尤其是高等教育经费),而新的经费来源有限;第三,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教师还没有做好准备迎接与研究型大学的概念有密切关系的知识生产所带来的挑战。

知识生产的两种模式

自俄罗斯大学体系创建伊始,大学和研究就处于半分离状态。作为俄罗斯基本科研机构的俄罗斯科学院创建于18世纪。20世纪,苏联政府的政策又加强了科学院和政府科研机构的研究作用。设有博士教育的研究所主要从事政府提供经费支持的研究。而高等教育的主要功能则被定为进行职业培训。但是,某些“传统大学”和其他一些名牌高校,尤其是那些为军事基地提供服务的高校也进行科学研究。这些高校也建有研究所、中心和实验室等科研机构,并聘用了一些科研人员。

苏联时代结束时,国家财政和计划的崩溃导致大学之外的科研机构在物质和人力资源方面都不断恶化。1990-2004年,科研机构的工作人员从200万下降到80万,其中50万是科研人员。目前高等教育体系有2.6万科研人员,占研发人员总数的5%,而公立大学共雇用了30万教师。

科研开支

高校的预算一般包括86%的教育经费和仅仅4.6%的研发经费。在主要的大学,尤其是公立大学,科研开支可能有所上涨,但仍

低于国际标准。例如,根据2004年的年度报告,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的科研经费占学校预算的12%,这些经费来自俄罗斯教育部、俄罗斯国家基金会、国际基金以及合同科研项目等。可能还有其他的科研经费来源,但大学并没有完全公开他们的全部预算。另一个例子是在俄罗斯教育部的大学排名中处于前30名的克麦罗沃国立大学(Kemerovo State University),其科研经费仅占学校预算的5%。

经合组织的研发经费数据证实了高等教育在国家科研中具有相当的作用。在俄罗斯,GDP中的研发经费,只有5.5%在高等教育领域,而美国这一比例为13.6%,德国为16.3%,英国为21.4%,荷兰为27.9%。

教师的科研情况

俄罗斯和其他国家高等教育体系的一个最重要区别是对教学的重视程度。政府明文规定,教师每学年的教学时数为900小时,高级教师不少于300课时,初级教师的课时量更大。

2006年,我通过富布赖特新世纪学者项目对703名教学人员进行了调查,他们分别来自“传统大学”、技术型大学、教学型大学以及俄罗斯各地区最有名的高校。约一半(52%)的教学人员回答说他们从没有参加过非政府机构提供经费支持的科研项目。除了自己的学位论文研究和院系进行的没有科研经费的项目以外,他们可能从未进行过其他科研活动。

科研经费通常来自俄罗斯国家基金会:在过去的3年中,所有的调查者中只有26%的人参加过基金会提供科研经费的项目。俄罗斯的其他机构也提供了一些科研经费,这些机构包括工业、商业等部门(占14%),以

及大学和学院（占 13%）。各级政府为 10% 的教师提供经费。国际科研经费所占比例引人注目，9% 的教师从国际基金会获得过科研经费，3% 的教师参与过外国机构提供经费的科研项目。

教师的论文发表情况反映了他们参与科研活动的程度低。在过去的 3 年，58% 的教师没有在采用同行评审制度的俄语期刊上发表过学术论文，29% 的教师只发表了 1-2 篇论文。仅有 8% 的教师在采用同行评审制度的外国期刊上发表过 1 篇以上的学术论文。总体而言，比较积极参与科研活动的教师只占被调查教师总数的 5%，其中的“积极从事科研”包括在俄语和外国期刊上发表论文以及获得科研经费。

研究型大学的展望

全球化所带来的挑战要求俄罗斯大学必须加强科研活动。对俄罗斯教师科研情况的调查表明，俄罗斯高校的科研活动远未达到合适的水平。影响高校科研水平提高的因素包括，前苏联将科研任务主要指派给科研机构的传统，初、中级教师的教学任务繁重，

政府向大学提供的经费不足，教师直接筹集科研经费的机会有限等。由于工资不够生活，许多教师同时从事很多其他工作。此外，一个适当的知识生产模式需要科研机构具有一定程度的财政自主权，而不管科研机构是哪一种类型的。但这种财政自主权在俄罗斯已逐渐削减，尤其是高校。财政自主权还需要对知识产权制度进行适当立法。这些条件目前都不具备。

在当前的条件下，俄罗斯还不能建立知识经济，也不能创建强大的研究型大学体系。在俄罗斯的经济以自然资源为基础、国家另有其他发展重点的情况下，科研的外部激励还比较薄弱。教师科研的内部管理机制也不完善（如科研评价和同行评价体制）。重视科研绩效和成果的文化尚未建立。

在后苏联时期，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鼓励高等教育与科研的融合。但真正的融合还面临着法律、组织、社会和心理上的障碍。

译者注：本文译自 Number 47, Spring 2007,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大学教师的评价与奖励：墨西哥的做法

Philip G. Altbach

美国波士顿学院终身教授、国际高等教育中心主任

教师评价是一个全球性的热门话题。评价、问责和激励已成为大学和政府部门关心的问题。但是在绝大部分国家，几乎没有真正的学术评价，问责制也只在一定的范围实行。在确定教师的待遇时，依据的是学术职务的级别和服务年限，而不是个人的绩效表现。事实上，绩效评价完全违背传统，有时还违背已经确立的人事管理实践。

在墨西哥的一部分学术职业中，已建立了一套复杂的评价机制，该机制直接与工资和报酬挂钩。了解墨西哥的大学教师评价和奖励机制是非常有意义并值得的，因为该机制可能对其他国家具有借鉴意义。我们将聚焦于墨西哥两所重要公立大学的情况，即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Universidad Nacional Autonoma de Mexico，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大学，其在校生为24.5万）和大都会自治大学（Universidad Autonoma Metropolitana，在校生为4.62万的著名公立大学）。这两所大学都建在墨西哥城。墨西哥其他公立大学的情况基本上与本文所讨论的这些实践一样，但墨西哥日益壮大的私立高等教育的情况与此差别很大。

本讨论主要是全职教授的情况，他们仅占国立自治大学教学人员的1/3。剩下的2/3都是兼职教学人员，他们每节课的报酬相对较低，只在很小程度上参与大学的管理。在这一方面，国立自治大学与墨西哥绝大部分大学都基本一样。大都会自治大学是个例外，其大部分教学人员都是全职教师。需要注意的是，“全职教师”也可能会在其他大学（通常是私立大学）上课，或通过提供咨询等其他活动来增加收入。

1990年以前，墨西哥的大学与世界上大部分的高校一样，极少或完全不根据教师的绩效评价结果确定其工资待遇。学校根据教师的职务、教龄决定其工资待遇，基本上也

不考虑教师所教学科的市场因素。这种制度阻碍了对高产教师的奖励，也妨碍了给不合格教师警告。此外，墨西哥大学教师的基本工资非常低，根本无法维持教师们享受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或者在大学中留住最优秀的人才。学术界需要引进问责制和差异化，以奖励那些多产的教师。引进新的评价机制的目的在于提高墨西哥大学教师的质量和绩效表现，这正是墨西哥政府出资建立新项目的原因为所在。大学管理人员也意识到了应该提高教师的报酬。增加工资收入和引进评价措施这两个目标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在新机制的实施中值得关注。

内部奖励体系

国立自治大学和大都会自治大学目前实行着一套复杂的、以绩效和其他标准为基础的最高工资补助制度。这种制度产生了一个差异化的工资结构。经过10年的发展，该制度日益复杂，引起了很多争论，部分功能已不再发挥作用。一些大学教师拒绝参加评价委员会或理事会，他们认为评价是浪费时间和金钱，而这些时间和金钱可以更好地为科研提供支持。奖励教授的标准被认为太过狭隘。另一种批评意见则是认为对特定派系人员的政治看法和偏袒已经渗透进学校或某些领域的评价过程。还有一些人认为，这一评价体系强调了“适者生存”的理念，激起了不健康的竞争，不利于合作研究的开展，造成了以单打独斗的方式开展学术工作的情况。大都会自治大学目前已对教师聘用和工资报酬结构进行重新审视。

就像上面介绍的，每位教师的基本工资都与教学绩效无关，并且很低。许多大学都已建立了一套自己的奖金和待遇提高制度。获得额外报酬的标准在最初是为了奖励产出而设计的，主要是奖励科研产出，但这些奖

励目前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变成一种普遍的奖励（除了最差的那些人）。另有一些人否定这些奖金制度，包括那些不受学校高层领导、学院或学校的政治派系或学术派系以及评价委员会欢迎的教师。科研产出通常根据教师所发表的学术论文和所出版的著作数量进行衡量，对于在国际期刊上发表的论文特别重视，而对在国内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则赋予很低的权重。教学方法上的创新和那些面向大众、以公共服务为目的的论文都不予考虑。将教学排除在绩效评价之外的部分原因在于很难对教学进行有效评价。目前世界上还没有评价教学的有效工具，在墨西哥的官僚体制中制定合理的评价标准尤为困难。

大学的内部奖励制度试图为教师提供更充足的工资收入，现已部分地实现了目标。但是这一制度已经被不基于绩效的评价标准和过度狭隘的评价范围所颠覆。一旦某个教师进入“优秀者”名单，就极少再被删除。如果在评价阶段科研产出被认为不合格，奖励金额可能不再增长，但依旧还享受原来的奖励。“基于绩效”的奖励现在变成了工资待遇中的常规部分。

国家科学和技术委员会与国家科研人员体系

对墨西哥一小部分大学教师来讲，其工资收入的另一更重要来源是由政府提供经费的国家科学和技术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实施的项目，旨在提高国家的科学产出。国家科学和技术委员会拥有自己的国家科研人员体系（SNI），该体系由各领域成果最丰富的大学教师和科研人员组成，作为对其工作的认可，每个人都能获得丰厚的补贴。墨西哥大学中只有很小一部分大学教师是该体系的成员，占大学教师总数的3%，全日制教师总数的10%，国立自治大学有2,352名，大都会自治大学有410名。大学教师通过同行评议获得加入该体系的资格，此后以持续的绩效产出作为保持成员资格的基础。除了丰厚的收入以外，成为国家科研人员体系的成员还意味着很高的声誉。建立这个体系的原因之一是鼓励墨

西哥最优秀的学术人员留在国内。国家科学与技术委员会重视科研产出，主要是发表的学术论文，但也包括所申请到的外部科研经费。与内部评价体系一样，本科教学和服务也不被认为是衡量绩效产出的标准。国家科研人员体系似乎运行得相当不错，根据大学教师的优秀表现（虽然对“优秀”的界定很狭窄）进行奖励，其成员被认为是墨西哥高等教育中最优秀的学者和科研人员。

结论

这些奖励措施已在墨西哥一些大学中建立了一个部分以表现优秀为基础的学术报酬体系。这些措施的实施表明，在一个反对进行彻底改变的高度官僚化学术系统中进行改革（该改革有两个目标，即提高高产教授的工资和制定评价产出的有效手段）是可能的。不幸的是，该体系日益严格，至少是在大学层面，且不再以表现优秀作为评价的基础，而只是为可怜的基本工资提供补充的一种标准方式。不论是大学还是国家科学与技术委员会，其评价标准的范围都非常有限，不承认与学术工作有关的所有方面。大学教师的工资少得可怜，已有许多学校提高了工资。对那些最高产的教师来说，工资已获得了大幅度的提高。人们已经广泛认可基于优秀表现进行奖励的理念，这是墨西哥官僚化学术体系取得的重大成果。

目前大都会自治大学正在反思其教师奖励体系。这些讨论可能会带来一个更好的体系，一个更能有效地根据表现优秀进行奖励的体系。墨西哥是一个认真对待教师评价的国家，它建立了一套复杂的奖励和评价机制，在一个高度政治化和官僚化的学术系统中实施了许多必要的评价手段。在墨西哥的现实情况下，这是个不小的成功。其他国家可以研究一下墨西哥根据表现是否优秀进行奖励的尝试，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

作者注：Manuel Gil-Anton 已在其著作《大城市喜欢学术职业》（Big City Love Academic Workplace）一文中讨论过这个问

题, 该文收录于 Altbach 主编的《上师的没落:
发展中国家的学术职业》(The Decline of the
Guru: The Academic Profess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2003) 一书。

译者注: 本文译自 Number 31, Spring
2003,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在边远地区建设研究型大学：日本的过失

Philip G. Altbach

美国波士顿学院终身教授、国际高等教育中心主任

日本政府宣布将在冲绳岛上建立一所新的研究型大学。冲绳岛位于琉球群岛，从东京往西南方向飞到冲绳列岛需要两个半小时的行程，该地区以热带天气和美国军事基地而闻名。对于这所新大学来讲，很难想象还有比这个岛更与世隔离的地方。该大学将着重发展生物技术，需要日本政府为其提供6亿美元的启动经费。日本政府宣布每年将向该大学划拨1.6亿美元的运营经费，但这个数额对于运营一所以理科为主的研究型大学来说是远远不够的。该大学计划一半的研究人员都从国外招募，并以英语作为教学语言。除了有可能从中国招聘一些科学家，许多世界顶尖科学家都极不可能到冲绳岛工作，这不仅仅是因为位置和环境，还因为日本国立大学高级教师的工资待遇并不具有国际竞争力。

除了为冲绳岛提供一些公共投资外，从其他任何一个角度看，在这样一个地方建立研究型大学都是非常糟糕的一个想法。我们可以从高等教育的发展中吸取重要的经验教训，或许日本政府还需要一段时间去反思这一决定。

在日本政府做出决定的同时，跨国医药公司诺华（Novartis）宣布公司正在把研究实验室从瑞士迁到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市，以便利用那里的科研设施和创业氛围。这说明了为什么冲绳岛不是建立研究型大学的合适地方。即使在网络时代，知识创新也需要公共设施、其他学术上和智力上的刺激。

虽然在当前环境下选择偏远的地方可能是特别有问题的，但确有一小部分顶尖大学或科学中心建在与世隔离的地方。19世纪建立在相对偏远地方（比如爱荷华市、伊利诺伊州的尔巴那市和香槟市）的一些美国著名大学，都遭受了地理位置孤立的一些苦头，很难招募到顶尖的科学家和学者。这就是为

什么著名的科学研究中心长久以来都建在大都市内部或附近的原因，这些城市具有良好的学术传统，如东京、京都、波士顿、圣弗朗西斯科、巴黎和伦敦。在冲绳群岛这样的地方建立教学型高校以为当地人提供培训和教育是一回事，而建立研究型大学则是另一回事。

很少有重要的科学研究中心建立在偏远地区，而冲绳岛就是一个偏远的地方。俄罗斯的新西伯利亚（Novosibirsk）和美国的洛斯阿拉莫斯（Los Alamos）也是这样的偏远地区。但这两个地区都服务于军事需要而非基础或应用研究，当时是有意选在更容易保证安全的地方。

日本将筑波大学建立在东京附近的茨城县（Ibaraki Prefecture）也是很有挑战性的。为了使东京市中心之外的高等教育多样化，而于1973年建立了筑波大学，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和大量资金投入才使其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中心。

在冲绳岛建立研究型大学所面临的一个难以逾越的问题是其地理位置对于其他学术机构和它想要服务的工业而言过于边缘化。它很难吸引顶尖人才到冲绳岛来，不论是优渥的工资待遇还是其他一些激励手段，况且日本国立大学的管理既不弹性化，也没有丰厚的工资待遇。应该牢记顶尖科学家相当稀少这一现实。吸引他们的是学术共同体，以及高收入和良好的工作条件。学术氛围包括很多无法估算的组成部分，比如书店、电影院、咖啡馆等等，所有这些都对学术人员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冲绳岛在地理位置和气候方面有很多不利之处，也缺乏其他学术和科学文化设施。

从日本目前的这个计划中可以吸取若干经验教训，不仅仅对于日本（还有时间去放弃这一想法），而且对正在筹建新的科研机构

的国家和地区都具有重要的启示。

主要的研究机构不应建在偏远或边缘地带。当然，为了给当地人民提供接受高等教育和学习技能的机会而在这些地方建立高校是应该的，但将研究型大学建在这些地方将很难获得成功。学术生活中的非正式设施是非常重要的。尽管当前可以通过因特网进行

交流和联系，但这不能替代与学术共同体，也不能替代与其他学者和知识产品消费者（公司、政府机构和其他组织机构）之间的直接联系。

译者注：本文译自 Number 28, Summer 2002,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创业型大学的特征

Burton R. Clark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荣誉教授

电子邮箱: clark@gseis.ucla.edu

创业型大学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 最初是如何形成的? 如何维持自己发展的? 在《创建创业型大学》(Creating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ies, 1998)一书中, 我通过追溯若干欧洲大学 1980-1995 年的发展情况, 明确了这些学校如何进行运行方式的重要改变, 即它们是如何转变到一种更具前瞻性的方式的。我认为从这些学校的个案中可以总结出 5 种转型方式: 多元化的资助基础、强有力的驾驭核心、拓宽的发展外围、激活的学术心脏地带、整合的创业文化。最近, 我在新著《大学的持续变革: 后续的案例研究与理论》(Sustaining Change in Universities: Continuities in Case Studies and Concepts, 2004) 中大量扩充了早期的分析, 对创业型大学正在形成的特征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

在这本新著中, 我努力寻找创业型大学的案例, 并进行更好地总结。通过对 14 所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创业型大学的个案研究, 我再次澄清了早期提出的大学转型方式, 而且进一步提出创业型大学获得不断变革新局面的动力机制。案例包括以前研究过的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欧洲出现的 5 所创业型大学: 英国的华威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Warwick)、苏格兰的斯特莱斯克莱德大学 (University of Strathclyde)、荷兰的特文特大学 (University of Twente)、芬兰的约恩苏大学 (University of Joensuu) 和瑞典的查尔姆斯技术学院 (Chalmers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从其他学者的论文中, 我又发现了 3 所转变为创业型大学的大学: 非洲乌干达的麦克罗罗大学 (Makerere University)、拉丁美洲智利的天主教大学和澳大利亚的莫纳什大学 (Monash University)。此外还包括美国 6 所多样化的研究型大学 (2 所私立, 4 所公立),

即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密西根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和乔治亚理工学院, 这些学校都是在激烈的竞争中勇于进取的典型。

被强调的首要变革动力是各种关键因素间紧密的结合与互动; 其次是建立渐进累积永续发展的动力; 第三是学校强烈改变的决心, 具有共同的愿景, 从而在应对社会需求时能激励和指导学校自我发展、自我选择。在一个个创业型大学的个案中, 我们发现了勇于改革的管理者、项目开发主管、经费和合同主管、继续教育主管等非学术人员, 比代表公共财政部门和高级管理委员会或董事会利益的传统“行政管理”人员更富于改革精神。我们看到创业型大学已具有全面的永续发展能力, 这一特征并不依赖于某一个权威的 CEO 或某一个明智的管理团队。变革已成为一个习惯, 一种体制化的生存状态。

由于每所学校在将共性特征与自己的特点结合在一起的方式上各具特色, 因此这些个案研究导致整个研究中的非共性特征增多。瑞典查尔姆斯技术学院的个案清楚地揭示了在一所从小到中等规模的大学中, 如何建立创新中心; 智利天主教大学生动有力地展现了大学如何在 15 年内完成落后师资队伍现代化工作; 密西根大学揭示了一所大众化、忙于多渠道筹集资金的公立大学如何与世界上最富裕的私立大学展开激烈竞争。个案研究的表述进一步将每所学校的独特之处与其共性特征展现出来。因此, 世界上只有一所麻省理工学院、一所特文特大学、一所莫纳什大学。

毫无疑问, 活跃而复杂的创业型大学在不同的复杂环境下运行, 所形成的也是各不相同的复杂结果。与整体分析高等教育体系不同, 院校研究更接近这些事实。整体分析

忽视了大学发展的关键方面，尤其是大学变化的组织特性，容易在国家政策制定和分类管理中迷失方向。而院校研究更能反应现实。简而言之，院校研究使我们可以发现成功地适应不同社会文化环境的创业型大学的有益个案。在对大学进行研究时，必要的个案实际展现了如何将应用性的研究与理解性的研究结合起来。

通过对这个专题的持续跟踪研究，我们逐渐发现创业型大学是一个具有变革能力的地方。变革是大学内部的集体表现，无论是院系、交叉学科和跨学科研究中心的创业团队，还是中观层面的学院，乃至整个大学，都具有变革能力。我们还发现，教师和企业经营者在各个层面都是交织在一起的，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理念，即学术价值是管理价值发挥作用的基础。

可能最重要的发现是，创业型大学具有多样化的筹资渠道，其财政状况既不严重地依赖于在国家政策部门占有一席之地的政治

家或官员随意的一时兴起，也不依赖于商业公司及其“商业”影响，甚至也不将学费作为主要的经费来源。学校的经费不仅来源于常规渠道，还来自其他公共机构（提供核心经费支持的国家部门以外的组织）、校友和其他私人捐赠者等关键渠道，它们提供的既有道德和政治支持，也有每年的直接经费和捐赠。有效的管理不依赖政府和市场，而在于大学的自我引导和自主决定。创业型大学确实为获得成功提供了一个新的基础。

我对创业型大学演变进行的定性个案研究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从被研究大学的实践中总结出的理论又通过类似事例的再现而被加强了。我们还需要能够揭示这一现实的更多优秀事例，以进一步阐明 21 世纪初期在世界各国迅速突起并发展的创业型大学的特征。

译者注：本文译自 Number 38, Winter 2005,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对校企合作的再思考：麻省理工、剑桥和东京大学的模式

Sachi Hatakenaka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企业绩效研究中心 (Industrial Performance Center)

电子邮箱: sachi@alum.mit.edu

校企合作已成为大学、企业和政府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尽管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理解，但大学应该在经济中发挥作用已成为全球的一个主导观念。大学往往把与企业的合作关系看作是一个新的经费来源。企业关注的收益领域比较窄，如雇用能干的学生或解决一些特定的技术问题。政府则希望大学能产生新的产业或者激发现有产业，经常将所孵化的高科技产品或专利许可作为衡量学校价值的显性指标。

这些不同的期望经常会带来一些冲突。许多大学感到非常沮丧，因为只有一小部分专利能够营利。政府以高科技产品或专利许可作为绩效指标，导致大学人为制造了大量尽管得到公共经费支持但不能获得商业成果的高科技产品和专利。公司和企业埋怨大学越来越贪婪，要求签订保密协议，但由于学生的自由流动，保密协议对大学来说是个难题。

大学的经济功能

笔者过去对麻省理工学院与剑桥大学、东京大学进行过的经验对比研究(Routledge, 2004)以及最近对大学在区域创新体系中的作用的研究都表明，大学通过学会用不同的方式执行传统的功能，能够将新的经济功能整合到正常的教学和科研活动中。大学可以让学生获得应对这个日益变化的世界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也可以让学生通过参与科研而探索基本的问题。社会将不是从变得越来越像公司的大学获益，而是从大学和企业的合作中获益，在合作过程中大学仍是一个知识创新和传播的独立机构。对大学来说，最重要的是与“现实世界”联系在一起，以确保其所开展的活动具有实用性。

与社会联系密切的学者

任何组织接近现实的关键都是那些与社会联系密切的学者。通过咨询、合作研究、举办会议、甚至是建立校友网络，都可以与现实世界联系在一起。与企业家的合作能让学者们了解企业界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发现有可能一直隐藏在公司背后的默会知识和私人知识。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曾经把从事咨询工作的学者描述为“正在授粉的蝴蝶”(pollinating butterflies)，他们看到了许多公司所面临的问题并产生了自己的洞见，能够在此基础上提供解决方法。

与社会联系密切的学者还能在教学中有效地让学生了解现实。这些学者的职能仍像以前一样，传授学生基本的学习技能以利于其今后的生活，但他们可以教授最新的主题和内容，这些都是在思考企业未来发展方向的过程中获得的。这些学者能从企业的私人知识中获益，确定学生应该学习什么内容。当代现实生活中的例子有助于激励学生学习，激励学生在今后的时间里运用所学的知识技能。如此以来，学生不仅能掌握最先进的知识，而且还可能对新兴重要领域产生兴趣。

在科研中，与社会联系密切的学者还具有另一个作用，即在科学研究的同时关注其应用价值。在发明创造时，他们可以充分地意识到这些发现的应用潜力。这就是所谓的“巴斯德象限”(Pasteur's Quadrant)，像巴斯德一样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学者们也像巴斯德一样关注科学研究的应用价值。

在我所研究的麻省理工学院、剑桥大学和东京大学中，都有与企业合作得非常好的学者。但在合作的频率方面、在学者们与外

部世界建立联系的难易程度方面,以及在通过与其他学者开展合作和招收学生或博士后以扩大校企合作的成功程度上,这3所大学存在差异。这些差异产生的原因在于3所大学管理其内部和外部组织边界(organizational boundaries)的方式不同。

外部组织边界的界定

在东京大学,我的研究是在1999-2000年改革的前期进行的,完全在东京大学2004年法人化改革和获得自主权之前,因此东京大学的学者们当时仍然要服从公务员法和其他政府法规。尽管这些政策未能阻止学者们自己与企业建立联系,但学者个人确实是在与公司签订协议、建立学生参与和保密规范方面,要进行更为大量的工作,付出了巨大努力,所有这些都未从东京大学校方获得任何帮助。东京大学擅长重复建立非常有限的“可接受的”校企合作关系,而不擅长支持学者建立新的校企合作。与其他两所大学相比,东京大学的组织边界更不容易突破以及讨价还价。

在剑桥大学,校企合作关系不仅得到积极讨论,并且经历了重要变化,学校并不反对与企业建立合作关系。事实上,学者们基本上可以自由地与企业建立合作关系,一些学者还试图与企业建立深层合作关系,他们从企业合作者那儿获得了大量洞见和支持。剑桥大学的组织边界是模糊的,由学者个人决定怎样与企业开展合作。这与麻省理工学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麻省理工学院对学者在校外可以承担的工作种类与数量,以及可以在校内与企业开展合作的方式,都有相当明确的规定。麻省理工学院对外部边界的管理有方,界限清晰;对如何与企业开展合作有明确的规定,这样学者能很容易地与企业建立合作关系。

大学内部的组织边界

三所大学之间的另一个差别在于内部边界的界定和管理方式。在东京大学,学者很乐意与其他大学的学术同行们开展合作,但跨学科的合作较少。尽管学校已经建立了几

个组织机构推动新领域的发展,但跨学科的研究通常是学者个人有意地在新的领域开展研究,而不是不同学科的学者之间进行合作。在剑桥大学,学院的环境有助于推进学术人员的跨学科合作,但很难找到维持和扩大合作的组织和物理空间。学科界限很难跨越,也缺少将跨学科的合作活动延伸至新领域的机制。

在麻省理工学院,设有被称为“研究中心”的组织机构,为不同学科的学者一起进行科研合作提供了组织空间。研究中心可以根据自己吸引外部资源的能力拓展研究活动,并因此招收研究生和博士后,甚至高级研究人员。但具有终身教职的学者来自并依旧继续隶属于原来的学科部门,直到新领域能有足够的实力影响学院的边界。跨学科研究中心也为企业提供很多帮助,因为企业的问题几乎很少局限于单一学科。

根据研究,我发现大学利用了企业的和私人的知识培养未来的人才、推动科学的发展。受益者并不仅仅是与大学开展合作的那些公司,而是包括现在和未来的整个企业界。我的结论是,大学发挥经济功能的能力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它们界定和维持内部与外部组织边界的方式。

管理者的作用

在校企合作中,大学管理者在管理组织边界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大学变化缓慢,通常不能容忍管理者单方面做出决定,但那些理解学术价值的管理者在与学者进行合理协商、修改并实施更有利于学者们参与校外活动的规章制度方面,也还是有相当大空间的。有关为企业提供咨询或者与企业建立合作协议的规定和原则,都有利于确保大学外部组织边界的渗透性。

同样,管理者在打破学科边界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主要是通过为跨学科合作提供空间和启动资金。管理者还可以为学者个人和学术组织开展合作提供组织激励和支持,这反过来也有利于推动新领域的教学和科研发展。

上面所讲的这些都不是容易做到的事

情。重要的是，管理的过程中不仅要有理解核心学术价值和学科边界特性的学术-管理人员（从学者出身的管理人员），而且还要有将外部世界的价值观带进大学的企业-管理人员。拥有这样一些能够理解学者、企业家和管理者并与之对话的“双面”或“三面”人才，非常有利于学校的管理。正是这些复合型管理人员在有效地管理着大学的内部和外部边界。

政府的作用

政府对校企合作中能发挥作用吗？我认为能。在麻省理工学院，许多重要的跨学科研究中心都是由政府提供经费建立的。企业提供的小额经费可以帮助成千上百的小型跨学科研究得以开展，但也迫切需要大额经费建立具有向心力的科学共同体。通过科学家

个人提出的研究计划自下而上地确定科学研究的进度是非常重要的，但如果能够在集中投资的环境中开展这些工作，就更容易形成科研共同体。出于对基础研究的应用价值的兴趣，国家卫生研究院、能源部和国防部都是美国基础研究经费的重要赞助方，这些机构对其感兴趣的相关领域投入大量的联邦经费以开展基础研究。联邦经费为美国大学将基础科学的前沿研究与应用联系在一起提供了另一个机制。

最终来讲，大学的经济功能必须由学校自己界定，但政府和企业的行为确实影响着大学活动的方式。三方应共同努力，让大学的科学研究更有实用性。

译者注：本文译自 Number 39, Spring 2005,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实践型教授与创业型大学

Henry Etzkowitz, James Dzisah

Henry Etzkowitz: 英国纽卡斯尔大学商学院教授; 电子邮箱: henry.etzkowitz@ncl.ac.uk

James Dzisah: 英国纽卡斯尔大学商学院研究员; 电子邮箱: j.s.dzisah@ncl.ac.uk

大学正在经历一种文化转变, 以便在知识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大学具有不同的使命: 教学型大学以教育为主, 致力于人才的培养; 研究型大学以具有创新性的张力将知识生产与教学联系起来, 已经证明教学与研究的整合比两者分开进行更有成效; 创业型大学包括教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大职能。在把研究与教学整合在一起的学术革命之后, 大学正在“第二次学术革命”的过程中促进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其为社会服务的第三个职能与前两个职能同样重要。

创业型大学从完全不同的学术基础发展而来。创业型大学的模式通常是在研究型大学的基础上形成的, 但也可能是教学型大学发展的战略。例如, 里约热内卢州立大学新弗里堡 (State University of Rio de Janeiro Friburgo) 校区采取创新学术和促进地区发展的策略, 从建立信息技术博士专业以及一个孵化器开始发展。

抱着创业的态度和战略愿景, 大学与其他机构开展合作, 以便在科学发现和应用之间架起桥梁。事实上, 大学与企业通过多种联合机制与公平的合作关系, 经常开展校企合作。但是, 包括一次性付清买断知识产权 (如诺华公司/斯克里普斯公司) 在内的传统校企合作模式是有问题的, 因为由此可能会出现以公司的优先事项为主, 或在学术发现的早期就带有商业倾向, 用于商业目的需要的科研转化过程。为解决这些问题, 一些大学通过“实践型教授 (Professors of Practice)”来提高科研转化过程。

实践型教授

创建于 19 世纪中期的麻省理工学院是第一所创业型大学。在学校的发展过程中,

为了建立大学、技术和经济之间的密切联系, 麻省理工学院在 19 世纪初期到中期, 首先在农业领域, 然后在工业领域, 充分利用了美国创造或引进的各种学术发现。19 世纪末期, 当麻省理工学院成为一所教学型工学院时, 就邀请了独立的咨询工程师作为学校的教师开始科学研究。

在那些通过聘请实践型教授来促进学校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的大学中, 目前也能找到类似的情况。这一模式事实上是将杰出的专业人士引入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哈斯商学院 (Haas Business School) 聘请了一位实践型教授做创业中心的主任, 该教授一半时间是大学教师, 一半时间是公司的风险投资者, 他建立了一支由全职商业人士组成且稳定的客座教师团队, 在哈斯商学院教授个性化的工商管理硕士课程。

实践型教授可以发挥多种作用, 在美国基本的作用是主要从事教学的非终身教职人员。这些教师类似于客座教师和科研人员, 其职责有限而明确。在麻省理工学院, 实践型教授特指那些在对学校的学术专业具有重要意义的学科领域有世界一流影响力且致力于提高这些学术专业水平的杰出专业人士。

实践型教授模式的推广

作为工业革命的起源地, 英国东北部决定扭转其作为工业地区不断衰落的命运。与 20 世纪早期麻省理工学院和新英格兰面临的境况相似, 纽卡斯尔大学实施了“科学城市”工程, 以便通过知识经济的发展复兴本地区。该工程重视以下四个领域: 老龄化和卫生健康、能源和环境、分子工程、干细胞和再生医学。这一工程正努力通过公司和大学的科研实验室振兴这个老工业区。

为了推动吸引高新技术公司到本地区的进程，纽卡斯尔大学改变了对实践型教授的想法，由从事教学转变为从事科研。最初设立了 4 个讲席，一半由学校支持，一半由该地区发展机构“英格兰东北经济发展署”支持。这些讲席用来吸引具有博士学位的高新技术公司的创立者。纽卡斯尔大学期望这些讲席教授能够提出一些因为太先进而不能在公司进行、但可以通过大学中的科研队伍进行尝试的研究理念，并吸引外部经费。最理想的结果是所有或部分讲席教授所属的公司能加盟纽卡斯尔大学。

在学校内部，纽卡斯尔大学希望实践型教授能成为打算创业的教师们的榜样，以及学校商学院和科学院系联系的纽带。纽卡斯尔大学期望这些实践型教授与“科学城市”工程所关注领域的领导者开展密切的合作，为科学转化活动及相关教育活动做出重要贡献。

结论

从原则上看，聘请实践型教授可以将大学三个主要职能的内部和外部作用联系起来。全校各单位都可以聘请实践型教授，从中级职位一直到高级职位都适用。例如，英语系可以通过引进出版业的博士来协助成立一家大学出版社。这种模式还适用于那些非常认真但并非全职从事创业活动的教师，以防止他们选择完全离开大学。

由于一些教师从常规的全职教授转变为兼职的实践型教授，将在大学和企业之间创建一种双向的流动。事实上，任何一所大学不管其水平和先前的职能如何，都具有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潜能。但是，只有拥有从学术界和非学术界聘请的教授的创业型大学，才能在学术发展和社会参与之间建立良性循环。

译者注：本文译自 Number 49, Fall 2007,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作为政策工具的大学排名

Jamil Salmi, Alenoush Saroyan

Jamil Salmi: 世界银行高等教育主管; 电子邮箱: jsalmi@worldbank.org

Alenoush Saroyan: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教育与咨询心理学系教授

1963年,当校内激进学生主办的报纸《加州报道》(Cal Reporter)首次公布学生对教师和课程的评价时,遭到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师和管理人员的反对。尽管最初受到反对,但学生评教已成为许多大学内部问责机制的组成部分。增加问责的要求不仅来自学生,而且也来自其他利益相关者,如政府官员、雇主、公众等。通过排行榜形式进行的大学排名成为满足那些对有关大学质量的信息感兴趣者的一种方式。

大学排名采用一系列指标来衡量大学的组织方式(投入变量)、功能和效率(过程变量)以及产出和影响(产出变量),对各大学的表现进行比较。

大学排名的扩展得到了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关注,一些国家(阿根廷、尼日利亚和印度)的反应相当不友善,而在有些国家大学排名则被当作认证过程的一部分。随着大学排名成为不断发展的产业,排名的精确性、相关性和适用性成为备受关注的问题。大学排名在公共政策、问责制和为消费者提供信息等方面能否发挥积极作用?本文将从国际视角来探讨大学排名如何被用于提高大学质量。

德国: 1990年柏林墙被推倒后,西德科学委员会的学者接到了对东德的大学进行评价的任务。委员会成员意识到,在西德缺乏对大学进行评价的传统下,当前的任务是制定一种合适的评价方式。独立的政策研究机构“高等教育发展中心(CHE)”在1998年发布了大学排名,最近该排名成为第一个能提供德国大学质量全貌的综合性体系。与《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和上海交通大学通过权重指标对全球大学进行排名的做法不同,高等教育发展中心提供了对成千上万的教师、学生进行调查得到的详细数据以及第三

方提供的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资料。根据某一特定指标或一组指标,读者可以找到每一所大学或某一具体学科在排名中的位置。读者甚至可以根据自己关心的指标得到自己的排名。高等教育发展中心制定的排名方法具有避免由大学自己提供数据而导致不公正的优点。奥地利和瑞士的大学最近加入了这一排名,接受了对德国大学进行排名所采用的标准。

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的大学排名是由高等教育委员会(HEC)2002年直接受命对大学进行评价时形成的,其目的在于促进整个高等教育体系迅速而全面发展,尤其是为本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提供支持。通过对本国大学的投入和产出进行比较,巴基斯坦已建立了一个奖励优秀、对需要改善的大学进行投资以巩固其发展的机制。高等教育委员会所采用的5个主要评价指标(教师资格、科研产出、学生、基础设施和经费)与许多其他国家的排名指标相似。

由高等教育委员会官员和大学代表组成的顾问委员会负责监管这一大学排名,决定是否将排名结果公布于众。由于一个地位重要的大学校长强烈反对,因为其所在的(公立)大学得分相当低,委员会同意不公布排名的结果。高等教育委员会所采取的方法是向每所大学单独公布重要的指标数据,尤其是学校在每个指标中的相对位置。例如,在具有博士学位教师所占比例方面,某大学被告知其在巴基斯坦所有大学中处于最低的1/4之列。尽管强烈反对公开大学排名的结果,但排名还是迫使大学慎重对待数据的收集。

德国和巴基斯坦的例子说明,在那些没有建立评价或认证机制的国家,大学排名可以有效地被用来监测和提高大学的质量。一

个很有趣的现象是，政府官员不仅在国内事务上，而且越来越多地在国际事务中利用大学排名。如在蒙古和卡塔尔，政府当局已决定仅仅为那些到世界顶尖大学留学的学生提供奖学金。

公众措施

新闻机构经常被批评将大学排名用作提高销售的伎俩。但是，大众媒体可以通过为公众提供相关信息而发挥实实在在的作用，尤其是在那些缺乏任何质量保证机制的国家。当波兰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建立许多私立大学后，非常需要有关这些大学质量的信息，这促使波兰《远景报》(Perspektyw) 首次发行了本国的第一个大学排名。类似地，在缺乏任何评价和认证机构的日本，《朝日新闻报》多年来每年发布的大学排名发挥着必要的质量保证功能。

哥伦比亚：哥伦比亚是拉丁美洲地区第一个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建立国家认证体系的国家，但由于认证是一个自愿的过程以及许多著名大学（公立和私立）认为没有参与的必要，因此这一新的认证机构第一年所评审的专业相当少。当该国主要的报纸《哥伦比亚时报》(El Tiempo) 2000 年公布所有接受认证的专业名单以帮助学生在择校后，大学日益感受到了参与认证的紧迫性。

法国：排名的另一个重要价值是激发公众对影响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问题进行讨论。当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大学学术排名”第一次公布时，法国就开始进行讨论，这是个很好的例子。当发现法国最好的大学只位列第 65 名时，《世界报》(Le Monde) 刊登了题为《法国大学的巨大悲哀》的文章，激起了广泛的讨论。讨论后所发现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法国大学不能像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那些更成功的高等教育体系一样挑选学术方面最优秀的学生。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大学之间完全缺乏竞争。

巴西：1996 年，巴西教育部引进了一个评估测试，旨在对所有大学的本科教育质量进行比较。该测试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排名，即根据其所培养的学生的平均成绩对大学的

专业进行分类。尽管该测试最初遇到了许多抵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认可，并逐渐影响学生对大学的选择。

尼日利亚：同样地，当尼日利亚国家大学委员会 2001 年首次发布专业教育排名甚至取消了一些教育项目后，私有企业的雇主开始对地方大学恢复信心，并雇用从排名最高的专业毕业的学生。

未来的发展

政府和公众日益关注高校的绩效。一些国家正努力创建带领知识经济社会发展的“世界一流大学”。其他一些国家在入学学生减少的困境下，试图招收更多的外国付费生。就像稀缺性、品牌和卓越在消费品的购买过程中发挥着支配作用一样，学生也在寻找可用于识别最好大学的指示。因此，尽管大学排名的本质受到争议并且有方法论上的不足，但大学排名还将继续存在。

通过对最近国际大学排名的分析，我们提出以下建议，以便让大学排名有益于大学、政府、学生、家长和公众。

明确排名测量的内容。尽管有关质量的定义是模棱两可的，但排名者应具体阐明其排名测量的和未测量的内容、排名的目的以及排名所服务的对象。排名指标的有效性、可靠性以及全面性可以根据指标定义，并通过审视被排名大学的类型（如教学、科研等）及其定位得以确认。另外，排名者应提供其排名所使用的原始数据，公开计算过程，以确保其排名可以被验证。

采用多项指标和方法而不是采用单一指标进行排名。大学排名应采用较多的指标，更加重视投入和产出指标以确保质量的各个维度在排名中都得到反映。多项指标将产生多种排名，而不只是一个全球排名，这样既可以了解大学的优势也可以知晓其缺点。

对类似的专业和高校进行比较。由于方法论上的局限，大学排名比较的对象比较具体时，大学排名才更有意义。因此，对专业进行排名比对大学进行排名更受人欢迎。

高校可以利用大学排名进行战略规划和质量改进。那些关注大学排名的详细数据以

进行基准分析的高校，可以利用特定的指标了解学校当前所处位置的決定因素，然后提高教学和科研质量。

政府可以利用大学排名来激发质量文化。在那些还没有建立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的国家，大学排名可以用来体现质量。同样的，在缺少全球质量认证机构的情况下，大学排名应为国际学生承担质量监控的任务。

将大学排名作为使利益相关者了解大学情况的一种工具。大学排名不应该被当作衡量质量的最终措施，还需要认证信息以及通

过雇佣者问卷调查和毕业生追踪调查所提供的劳动力市场的数据来补充有关大学的信息。排名结果也可用来激起全国对高等教育的长期发展战略和政策展开讨论。

作者声明：本文的结果、表述和结论完全都是作者本人的观点，并不代表世界银行的观点。

译者注：本文译自 Number 47, Spring 2007,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大学排名的困境

Philip G. Altbach

美国波士顿学院终身教授、国际高等教育中心主任

大学排名、专业排名、院系排名在国际上迅速蔓延。国内排名无处不在，国际排名也至少有2个。这些排名受到了广泛的批评，批评排名的方法不完善以及排名概念本身，但每个人都在使用排名。如果排名做得好，对于消费者、政策制定者有价值，对于高校也很有意义，因为高校可以通过排名与国内同行进行比较。

排名各种各样，既有自封的专家空想出的排名以及商业组织建立的营利性排名，也有学术和科研组织非常严肃的排名。《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英国的《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和《金融时报》、德国的《明镜周刊》、墨西哥的《改革报》(Reforma)、亚洲的《亚洲周刊》(Asiaweek)(该期刊已不再发布排名)等出版机构都发布了大学排名。一些出版机构，如《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和《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的排名已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尊重。排名已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公共合法性和信任，因为有些排名是由著名的研究和政策机构发布的，如英国拨款委员会进行的科研和教学评价、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发布的学科排名。过去几年里，上海交通大学和《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都发布了世界大学排名。

排名存在的合理性

排名已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但过去的几十年里迅速增长。对排名的关注现在也高得多。排名的目的很多，有好的，也有坏的。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排名是不可避免的，高等教育经费的提供者和公众都希望知道哪些高校是最好的。政府和教育经费拨款部门也想知道如何进行最佳投资，并且需要区别地对待众多高校。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要求分化，因为高校有不同的目标，学生入读大学的目的也多种多样。如果排名能够多元化，

采用不同的标准对大学进行分类，将有利于学术体系的分化，并因此让决策过程更加容易。

为了声望、招生和教师招聘等多种原因，大学也力图使其地位合法化。全世界的高校和各个国家在经费、声望、最优秀的学生和教师等方面展开了日益激烈的竞争。在那些希望就读于顶尖大学的学生中间、希望能应聘到最优秀的大学工作的教师之间都存在激烈的竞争。而高校为了获得科研经费和公共支持也在激烈竞争。竞争长期以来只存在于一小部分学术体系中，如美国，如加拿大(某种程度上)，对许多国家来说是一个新事物。大部分国家直到最近才拥有少数精英大学，这使得学生被哪所高校录取并没有较大的差别，排名和竞争都不存在。

排名存在的问题

大学排名所产生的问题已不是理念原则性的，而是该如何运作它。如何能够准确地衡量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某所大学的质量以及世界各国高校的质量？很多排名类似于“人气竞赛”，即通过询问学术界成员特别是管理者对其他高校的意见进行排名。这一方法在那些发布大学排名的杂志和新闻报纸中尤为盛行。甚至是最成熟的大学排名也包括声誉调查，尽管还采用其他的测量方法。

排名采用的指标包括外部经费、教师的论文和著作数量、图书馆资源、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比例以及生源质量(根据学生入学和其他测试的成绩衡量)，当在数量达到了一定程度时就被认为是质量不错。但论文的数量并不必然与论文的质量和影响力有关。那些在生物医学领域具有优势的高校通常比那些以人文或社会科学见长的高校获得的外部科研经费和合同经费更多。排名通常不包括教学质量。事实上，还没有获得广泛认可的

衡量教学质量的方法，评价大学教育对学生的影响至今还是个尚未探索的领域。

大学有不同的任务和目标，而排名通常忽略这些问题。排名通常强调顶尖研究型大学的标准。这一做法有两个假设，一是用一把尺可以量天下，另一个是研究型大学的标准就是金科玉律。本科教学、部分专业学位教育、公平的入学机会等内容在大部分排名体系中都没有得到充分体现。

国际关注

如果大学排名在国内是有问题的，那么它在全球将面临更多的挑战。论文发表情况通常强调那些采用同行评审制度的期刊，如收录在汤姆逊科技数据库中的期刊。绝大部分期刊采用英语写作，以美国和英国的主要学术标准作为论文遴选的根据。尽管英语已日益成为自然科学领域的语言，但它并不必然是人文、法律和其他学科的主要交流语言。利用国际上的认可，如诺贝尔奖，作为表征卓越的一个指标，对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是不利的，因为这些领域没有设立诺贝尔奖，同时这使得发展中国家和较小的大学进一步处于劣势地位。将论文引用数作为衡量优秀的方式也会产生严重的问题。这样的论文引用数强调用英语写作的论文和期刊，这些在较大型的学术体系中容易产生。例如，众所周知，美国科学家主要引用美国其他学者的论文，而往往忽略其他国家学者的研究。这将人为地提高美国大学在排名中的地位。事实上，用来评价教育质量和构建排名的所有指标都提高了主要英语学术中心（尤其是美国和英国）的大型大学的地位。而且那些拥有医学院和以硬科学见长的大学通常在大学

排名中具有很大优势，因为这些学科可以获得更多的外部经费，其研究者能发表更多的学术论文。

结论

大学排名是有用的。排名关注学术成就的关键方面，可以影响那些试图削减教育预算和维持平庸的政策制定者。每个人都希望成为“第一”，国家也希望拥有顶尖大学。排名会激励学术界努力改善质量，鼓励学术竞争并提高科研产出。对公众来讲，排名是对卓越进行的基准比较。排名有利于区分各高校，因此可以有利于高校设定不同的目标和任务。

但是排名也经常测量错误的事项，采用的指标也存在问题。它们强化了已有的特权，强调某些学科（主要是硬科学）而忽略其他学科。排名忽略大学重要的职能，比如教学，不关注大学怎样影响学生的成长。

解决这些问题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在大学排名的过程中有许多互相冲突的利益在相互博弈。构建获得一致认可的排名标准是有益的第一步。设计出合适的方法衡量各种排名也非常必要。排名过程透明是关键，当前许多排名的标准和方法都不清楚。采用重要学术霸权者的标准和价值观并不能准确地衡量全世界大学的质量，也不能产生有意义的世界大学排名。在竞争激烈、以市场为导向的 21 世纪，排名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可能是必要的。现在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确保排名提供准确且有意义的评价。

译者注：本文译自 Number 42, Winter 2006,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全球高等教育竞赛

John Aubrey Douglass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高等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员

电子邮箱: douglass@berkeley.edu

美国最早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并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收益。现在,全球许多国家也在各自的政治和文化背景下朝这一目标迈进。受到高等教育将在国家的经济竞争力和社会经济流动方面日益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观点的驱动,高等教育竞赛已经出现。因此,高等教育已成为全球重要的增长部门。尽管各个国家和地区在高等教育的结构和文化上存在很大的差异,但政策措施和发展轨迹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这反过来又扩大了高等教育的规模。

然而在全球其他国家都发展的趋势中,美国却已经进入高等教育的入学率和毕业率都停滞不前的时期。不仅美国而且世界其他国家可能都没有充分理解这种低迷的状况。

美国高等教育的入学率

根据经合组织公布的数据,总的来说,在接受高等教育及获得学位的国民人数方面,美国仍处于领先地位。然而,在较年轻的群体中出现了变化:2005年美国18-24岁人口的高等教育入学率为34%,而2000年这一数字为38%,整体上有所下降。

在美国,边读书边工作的学生以及入读两年制学院的学生都增加了。富裕家庭的学生进入四年制大学。然而,低收入甚至中等收入家庭的学生现在则更可能进入二年制学院,他们拿到学士学位的可能性更小,而且获得学位所需的时间也比过去长。虽然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复杂且难以找到解决方案,但这看起来却是一种令人不安的趋势。

与美国不同,在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对照组中,许多国家18-24岁人口中高等教育的入学率正接近50%,少数国家已经超过50%。另一个差别在于45%的美国学生就读于两年

制学院,而大部分欧洲学生接受的是本科教育。

导致美国落后的原因之一是,美国高中生的毕业率2004年仅排名世界第19位,这可能还是乐观的估计。与其他工业化国家相比,在接受高等教育并获得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人口比例上,美国位列第14名。因此,美国成为经合组织中年长一代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超过年轻一代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

在美国某些州,如第一个采取综合措施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加州,传统适龄人口的高等教育入学率也在过去20年显著下降。1970年,加州55%的公立高中毕业生直接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位居全国第一;2000年,这一比例仅为48%,其中绝大部分学生进入社区学院,大部分学生半工半读,大部分学生注定无法完成两年的学业,更不要说获得学士学位了。这一现象发生在对劳动者所受高等教育和培训要求日益提高的经济环境中。2006年进行的一项研究估计,到2022年,加州1/3的新增工作要求具有协士学位、学士学位或更高,这类工作的增加速度已经超过整个州全部工作的增加速度。

竞争对手的情况

在欧洲,促进高等教育入学率提高的举措已经跨越了国界。大学的发展对欧洲国家来讲是如此重要,所以许多国家目前都按照1999年的博洛尼亚宣言整合学位标准(与美国模式相似)。2005年5月,45个签约国加入博洛尼亚进程。

在欧洲,对如何提高高等教育入学率的各类讨论都弥漫着市场化和放松监管的呼声。然而,政府却正在进行改革并制定有关高等教育入学、毕业和质量的管理制度。

此外，与美国相比，欧洲各国政府发挥了更多的作用，部分原因在于历史和文化差异。美国公立高等教育的发展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处于新建高校和制定自我管理体制的有机过程中。而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国家，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有些国家可能晚些）精英高等教育才在政府的作用下发生转变。

美国高等教育的低迷期

是什么原因导致美国高等教育曾经的优势地位受到破坏呢？这些错综复杂的原因可以分为四个主要方面。

如上所述，原因之一是美国高中教育质量的参差不齐，一些州的高中毕业率确实有所下降。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对公立高等教育（80%的美国学生就读于公立高校）的政治兴趣和投资下降。上个世纪为美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提供重要资源的联邦和州政府

的合作消失了。这一现象又导致了第三个原因，即大学学费的上涨而财政经费增加不足。最后，除对少数几所公立大学的入学问题和成本遏制进行过政治斗争外，美国高等教育仍是次要的政治问题。由于对作为高等教育主体的公立高校的投入不足而造成的公立教育危机，不是政治家们关心的主流问题。由于以上和其他多方面的原因，美国在维持其高等教育的优势方面已变得相对自满了。

作者注：本文选自作者《招生条件：入学机会、平等和公立大学的社会契约》（*The Conditions for Admissions: Access, Equity, and the Social Contract of Public Universities*）一书。

译者注：本文译自 Number 49, Fall 2007,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从研究生到全球化的世界公民

Maresi Nerad

美国华盛顿大学研究生教育创新和科研中心 (CIRGE) 主任

电子邮箱: mnerad@u.washington.edu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 社会变得更加依赖信息和知识。信息社会依赖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应用。由于在新知识的生产 and 未来领导者的培养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大学的地位显得独特, 这一作用尤其体现在博士生教育领域。

为了应对全球化竞争的压力, 部分国家已引入并实施了新的博士生培养体系, 包括德国的研究生院 (Graduiertenkolleges)、澳大利亚的合作研究中心培训计划 (Cooperative Research Centre Training program), 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研究生教育和科研实训一体化计划 (Integrated Graduate Education and Research Trainee Programs)。新的博士生教育体系一般具有以下共同特点: 通常是以问题和主题而不是以学科为导向的; 从事与外部世界相关联的多学科研究; 通过多方位的指导提供职业社会化教育; 提供职业技能培训, 如演讲、教学、发表论文、填写科研经费申请书; 把团队合作作为博士生教育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 国际交流与合作。

对博士生教育项目的评价

展望博士生教育未来前景的一个途径是评价当前的博士生教育项目是否适应知识社会的发展, 并对新出现的博士生教育形式进行评价。华盛顿大学的研究生教育创新和科研中心正在通过对博士学位获得者的研究, 建立一个评价现有和新出现的博士生教育项目的实证数据库。该中心也对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提供经费资助的研究生教育和科研实训一体化计划进行评估。评估重点考察这些项目是否适应新经济的发展需求, 是否能解决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有关研究生教育讨论中的重要问题。

21 世纪的博士生教育

通过 10 年来对博士生教育成果的研究以及研究生教育和科研实训一体化计划所得出的评价结果, 研究生教育创新和科研中心发现博士学位获得者对多导师指导、跨学科解决问题的方法、多学科的科研环境以及不同学科的同行一起研究的机会感到非常满意。

根据研究生教育创新和科研中心的研究和评估, 我们对未来的博士生教育提出了以下建议。未来的博士生教育应具有以下特征:

1、引进关注知识的本质、知识的基础及知识的有效性的认识论课程, 让博士生为从事交叉学科的工作做好准备。由于大部分科学、技术和社会问题变得非常复杂, 无法由个人或从单一角度解决, 因此需要从多学科的角度开展科学研究。

2、通过培养学生的教学技能、面向不同的观众阐述科研发现的演讲能力、撰写和发表学术论文的能力等, 将专业技能培养和博士生教育整合在一起。简而言之, 为博士生未来从事不同的职业做好准备。

3、引进多导师培养模式。要求每一位教师都像理想中的导师那样在所有方面对学生进行指导是不现实的, 会引起教师的强烈反对。一个顾问小组的建立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建议、意见和连贯的指导。

4、引进有效的团队合作, 为学生提供在小型科研项目中开展合作的机会以及与同学或老师合作撰写论文的机会。

5、与其他国家的博士生教育项目进行有计划的国际合作, 对一些全球问题或议题展开研究。

6、鼓励经济发达国家与研究资源和基础

设施贫乏的不发达国家之间在科研合作方面开展多样化的交流。

7、再次提出外语要求，尤其是在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在博士生教育中缺少外语要求已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由于不能与同事和合作者进行直接的交流而所失甚多，仅仅用英语交流使得一些学生处于优势地位而使其他学生处于不利地位。

8、开创一种方式，唤醒学生的公民参与和世界公民意识并令其为之努力。世界公民意味着公民在走出国门后，不寻求同化他人，而是接受差异、包容多样性。

在迎接信息社会的过程中，高等教育体系需要做出进一步的改变。我们建议博士生教育应重点关注为博士生成为世界公民创造机会，让他们不仅可以在精英人才组成的小团体中工作，而且能“跳出进行批判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成为世界公民，具有以公共生活、社会与道德责任等愿景为基础的知识和行动”（Henry Giroux）。实施这样的博士生教育将成为我们未来的任务。

译者注：本文译自 Number 40, Summer 2005,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在美国留学的博士生：去留问题的调查

Deepak Gupta, Maresi Nerad, Joseph Cerny

Deepak Gupta, Maresi Nerad: 美国华盛顿大学研究生教育创新与研究中心; 电子邮箱:
cirge@u.washington.edu

Joseph Cerny: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科研副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

对在美国高校取得博士学位的留学人员的讨论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 即哪些人(多少人)留在美国, 哪些人(多少人)回国? 为了探讨这一问题, 我们开展了名为“博士——10年后的发展”的情况调查。玛萨·内瑞德(Maresi Nerad)和约瑟夫·切尼(Joseph Cerny)是该研究的主要调查者, 研究经费由梅隆基金会赞助。本次研究对1982-1985年在六个专业(生物化学、计算机科学、电子工程、英语、数学和政治学)获得美国高校博士学位的近6,000名留学生的职业发展进行了调查。在调查的所有样本中, 人数比例最大的是电子工程专业(占38%)和数学专业(占30%)的博士生。这两个专业中, 来自中国台湾的学生最多, 其次是来自印度的学生。在电子工程专业, 排第三的是韩国; 而在数学专业, 排第三的是加拿大。

本研究发现, 将近40%的博士留学生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都是在美国以外的国家, 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回到自己的祖国工作(不包括毕业后进博士后流动站的博士生)。博士毕业10-14年后, 这一比例增长了15%。博士毕业后职业生涯的第一份工作反映出了博士们的志向抱负、所学专业以及所选择定居国家的就业结构和市场三者之间有趣的相互作用。

尽管40%的博士留学生回国开始职业生涯, 但不同专业和来源地(甚至同一国家不同地区)的博士们的情况差异相当大。政治学和英语专业的博士毕业生离开美国的比例最高, 大约有1/2到2/3的博士选择离开。技术学科(计算机科学和电子工程专业)的离开率较低, 这些学科都是博士留学生人数相对集中的专业, 只有1/4的博士离开美国开始第一份工作。在选择离开美国的博士中存

在很大的差异, 主要取决于来源地不同。来自非洲、中美洲、拉丁美洲、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博士最有可能回国工作, 回国率达到2/3。相反, 那些来自东亚和欧洲的博士只有1/3选择回国工作。南亚国家的博士留学生回国率最低, 离开美国的不到1/10。

同一区域不同国家的博士留学生在第一份工作地点选择上并不一定一致。例如, 尽管绝大多数日本博士(4/5)和韩国博士(2/3)离开美国开始博士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 但来自中国台湾和香港的博士只有1/5离开美国。同一国家不同专业的博士留学生在回国选择上并不一定一致。来自中国台湾的22名计算机科学专业的博士中, 没有人回国开始第一份工作; 而在来自中国台湾的25名数学专业的博士中, 有一半回国发展。另一方面, 90%或更多的来自印度的数学和计算机科学专业的博士选择留在美国发展。因此, 博士留学生第一份工作地点的结果是大区域趋势与同一区域不同国家、同一国家不同专业之间显著差异的结合。

影响博士留学生选择第一份工作地点的因素是什么呢? 是否就如经济学文献所说的, 美国与其来源国的相对经济条件是决定因素? 或像其他研究所暗示的, 与美国的移民政策直接有关? 留学生的回国决定是否与其来源国的政府所实施的某些政策有关? 是否这些因素更多的与个人有关, 而不与经济或政治激励有关, 如希望靠近朋友和家人, 或者生活在自己的文化中?

答案正如所料想的那样, 包括上述所有理由。但是, 影响“回国”决定的因素存在一个压倒性趋势, 即那些回国的博士留学生出于种种原因, 在出国之前就已经决定毕业后要回国。许多博士留学生好像是在博士学习

将要结束之前才知道是留在美国还是回国发展，但并不是所有的博士都这样。那些回国的博士留学生大体上都是“必须”回去的，原因在于文化价值取向，亲友、雇主和政府对他们的强烈吸引力或者个人希望为国家和社会做贡献。

总体来讲，那些留在美国的博士绝大部分更年轻，在博士学习阶段更不太可能结婚。性别在决定生物化学和数学专业的博士毕业生是否离开美国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些学科的女博士相对来说更倾向于留在美国发展，数学专业离开美国的女博士不到20%，留在美国的女博士中，50%是数学专业的。相反，英语专业的女博士更倾向于回国而不是留在美国。英语专业的女博士2/3离开美国，回国的女博士中，1/3是英语专业的。与女博士相比，男博士的去留选择则相反。数学专业50%多的男博士离开美国，电子工程专业的比例为25%。

“读博士的主要经费来源”是另一个重要因素。在那些回国发展的博士中，1/4以上的博士由来源国的政府或雇主提供学习经费。相反，那些留在美国的博士中，90%的人主要通过担任助教或助研的收入来完成博士学业。

最后，回国的和不回国的博士在完成博士学业时所确定的职业目标是相反的。与那些留在美国的博士相比，生物化学、计算机科学和电子工程专业的回国博士对学术工作

所表现出的兴趣大得多。相反，在那些主要职业选择是学术工作的专业中，如英语、数学和政治学，留在美国的博士比回国的博士更偏爱学术工作。

决定离开或留下的理由与被调查者所罗列的影响第一份工作选择的重要因素是相互回应的。对在美国和不在美国从事第一份工作的博士留学生进行对比，可以发现他们在动机上存有明显的差异。两类群体都认为同等重要的理由有：“发挥博士教育的价值”、“工作有兴趣或有挑战性”以及“很有机会从事科研”。但与选择留在美国的博士相比，那些离开美国的计算机、电子工程和数学专业的博士更少考虑工资、职业抱负或组织声誉等问题。已经或正要离开美国的博士在选择第一份工作时，不管所学的专业是什么，都更少有人是因为“就业市场有限”或“这是能够找到的唯一一份工作”而做出选择。最后，在一些博士回国的原因方面，那些回国的博士比留在美国的博士更倾向于将“靠近父母、亲友”或“为社会做贡献”作为影响其第一份工作选择的最重要因素。每个专业的博士都是如此。很明确的是，尽管非金钱因素并不必然与第一份工作选择直接相关，却是影响博士生做出回国决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译者注：本文译自 Number 31, Spring 2003,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科学与工程领域的高等教育趋势

Jean Johnson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电子邮箱: jmjohnson@nsf.gov

几十年来, 基于知识可能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观点, 许多国家都将加强科学与工程领域的高等教育作为一个发展策略。20 世纪 90 年代, 这一观点非常普遍, 绝大部分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开始改进其高等教育体系, 尤其是在自然科学、数学、工程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 旨在为知识经济做准备, 让国家具有从事突破性研究的能力, 这种能力将带来创新产品和世界市场上的成功。这一变革通过科学和工程教育中的三个重要趋势被突显: 在许多国家, 大学培养研究生的能力日益增强; 越来越多的外国学生到发达国家学习, 弥补了发达国家大学适龄人口的下降; 具有博士学位的留学生在决定留在国外、回国或在国内外往返工作时的选择更多。

博士学位的变化趋势

根据获得博士学位者的数量变化趋势, 可以发现欧洲和亚洲部分国家在科学和工程领域提供博士生教育的能力正日益提高。中国大陆、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已建立了新的高校培养科学和工程领域的研究生, 同时大幅度扩展了国立大学现有的研究生教育项目。目前, 中国大陆在亚洲地区具有最大的科学和工程领域博士学位授予能力, 日本的博士学位授予数在最近十年里增长了一倍。法国、德国和英国在科学和工程领域的博士学位授予数最近 20 年也增长了一倍以上, 仅 1998 年有些下降。经过 20 年的扩张, 美国在科学和工程领域的博士学位授予数在 1999 年首次出现下降。

随着亚洲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科学和工程领域培养博士生能力的不断提高, 它们对美国博士生教育的依赖性逐步降低。例如, 最近 5 年中国和韩国学生在科学和工程领域获

得本国博士学位的人数多于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数。1999 年, 中国台湾的学生在台湾本地的大学获得的科学和工程博士学位数首次超过了在美国大学获得的博士学位数。这些趋势还意味着在美国之外获得的科学和工程博士学位的比例变化, 最终有可能引起科研能力、科研产出和创新能力的相应变化。

人口统计学的趋势和潮流

美国在科学和工程领域博士学位授予数下降的部分原因在于大学适龄人口的显著减少, 所有主要的工业化国家都存在减少现象。从 1980 到 1997 年, 美国的大学适龄人口下降了 20%。欧洲大学的下降趋势甚至更厉害, 1985 到 2005 年间下降了 27%。到 2015 年, 日本的大学适龄人口将减少 30%。这些趋势部分解释了为什么西方国家和日本的大学需要扩大科学和工程领域的研究生入学人数, 以及为什么来自中国、印度等国家的外国留学生在不断增加, 中印两国大约有 9,000 万左右的大学适龄人口。

有证据表明, 到工业化国家留学的科学和工程领域的研究生数量在日益增加。就读于英国大学的外国研究生从 1995 年的 28.9% 增长到 1999 年的 31.5%。美国大学的留学生数一直居高不下, 留学生约占工程科学、数学和计算机专业研究生总数的 40%。工业化国家学术研究总量的增加与大学适龄人口的减少, 是导致科学和工程领域的学生向发达国家流动的部分因素。除了美国、法国和英国, 日本和德国现在也进入了接纳大量外国留学生的传统国家之列。日本计划招收 10 万名外国留学生的目标已经多次作为重要指标被讨论。1999 年, 日本共有 2.2 万名研究生层次的外国留学生, 主要来自中国和韩

国，其中留学生约占科学和工程领域研究生总数的 10%。德国也从印度和中国招收留学生以满足其研究型大学，尤其是在工程科学和计算机科学领域的需求。

不断增加的流动机会

科学家和工程师返回祖国的逆向流动是一个日益显著的变化趋势，因为许多国家都在通过高校实力和科研能力的提升，增加科学和工程领域的工作机会。1998 年，绝大部分在英国大学获得科学和工程博士学位的外国留学生毕业后都返回了自己的祖国。事实上，所有获得博士学位的马来西亚和土耳其留学生都选择了回国工作，这两个国家都在出国留学人数最多的 10 个国家之列。爱尔兰是唯一的例外，只有不到一半（45%）的科学和工程领域的博士学成后回国。在美国大学获得科学和工程博士学位的外国留学生回国的情况因国家而不同：墨西哥和巴西留学生的回国率最高，印度和中国留学生的回国率最低。

除了回国工作之外，为祖国的科学发展作贡献的可选方式还有很多。那些仍旧留在国外的博士留学生正通过合作科研、短期访

问和科学家网络为科学和工程领域的知识传播做贡献。

结论

工业国家大学适龄人口的缩减为外国留学生到发达国家接受科学和工程领域的研究生教育、学习前沿知识提供了机会。因此，当留学生学成回国或者与国内的科学和工程领域的学术界保持联系时，就带来了科学和工程知识更多地流动和传播。科学和工程知识的全球传播以及其他国家博士生教育的发展，意味着在美国之外产生的学术研究与发展、科学知识将占有更大的份额。这在合作与信息交流的有效形式方面，对美国提出了挑战，以便做到与其他国家和地区日益增强的科研能力建立联系并从中受益。

作者注：这些趋势的数据和分析已发表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报告《科学和工程指标（2002）》（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2002）。

译者注：本文译自 Number 24, Summer 2001,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全球舞台上的中国大学：大学领导者的视角

Ruth Hayhoe, Julia Pan

Ruth Hayhoe: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研究院教授; 电子邮箱: hayhoe@bellsouth.net

Julia Pan: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电子邮箱: jpan@oise.utoronto.ca

中国政府自 1993 年开始实施优先发展本国名牌大学的政策, 当年宣布实施“211 工程”, 全国的大学都可以通过制定战略标书竞争中国前 100 所名牌大学的地位, 中标的大学将获得建设经费, 以在 21 世纪达到世界一流的标准。1998 年 5 月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时, 中国又启动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985 工程”, 为少数顶尖大学集中提供大量的经费支持。

2004 年 7 月, 我们访谈了“985 工程”一期重点建设的 9 所高校之中的 3 所: 上海重要的综合性大学复旦大学、在自然科学和工学领域很有优势的上海交通大学, 以及位于杭州的浙江大学。我们还采访了华东师范大学的校长, 该校是中国最好的师范院校之一。这几所大学的领导者一致认为, 中国的大学应采取积极的措施推动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 以便与本国不断提高的经济地位保持一致。他们同时也指出, 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主要关注科学成就和声誉, 而对学术自由的制约则继续阻碍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发展, 束缚着思想和文化领域的创新。每所大学的领导者对学校近期的目标和成就所描绘出的画面都有些不同。

对培养思考者的制约

复旦大学的副校长认为复旦大学最大的一个优势是学术独立的传统, 该传统可以追溯到学校早期作为一所私立大学的年代, 2005 年是该校的百年校庆。他强调复旦大学的首要责任是培养思考者。他特别提到了东京大学措辞非常鼓舞人心的新章程 (该章程于 2003 年 3 月生效), 并指出他正敦促复旦大学的校长及时制定学校章程, 清晰地阐明本校的学术任务并在百年校庆时发布。在学

校的领导者方面, 他对当前完全以学术标准为基础任命高级领导人相当自豪, 并解释了北京大学的校长、著名的生物学家许智宏是如何主持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遴选委员会工作的 (生命领域是复旦大学特别著名的领域之一)。

一所新合并的大学

浙江大学 (简称浙大) 的副校长强调了学校长期以来坚持的“追求真理” (求是) 的精神, 该精神可追溯到学校的前身——1897 年建立的求是书院, 以及 20 世纪 30 年代国际著名地质学家竺可桢担任校长的时期。他强调浙大以培养既有创新能力又能“做成事情” (干活) 的领导者著称。20 世纪 50 年代在前苏联的影响下, 浙大转变为一所工科大学, 其文理学院、医学院和法学院改建为独立的高校。1998 年这些高校重新并入浙大, 被认为是这一时期最成功的大学合并, 激励着学校领导者积极向世界舞台迈进。浙大最近承担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大学创新联盟 (Global Universities Network of Innovation) 亚太领导者的责任, 并积极参加努力与亚太经济合作论坛进行互动的环太平洋大学联合会 (Association of Pacific Rim Universities) 的活动。在文化引领方面, 浙大最近任命了哈佛大学世界著名的儒学哲学家杜维明为客座教授。教育学院的院长也正积极地提出在全国优先支持文化和教育事业发展的建议。

新文化行动

上海交通大学在历史上与浙大齐名, 该校 1896 年由中国一位热衷于发展应用科学的杰出企业家创立。与浙大相似, 在前苏联模式的影响下, 上海交通大学也受到了严重

的损失，但该校通过自己的创新举措而不是并校，建立了目前的杰出地位。在保持学校在基础科学和工学领域的传统优势的同时，该校又新建了管理学院、人文学院、媒体与设计学院、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法学院和外语学院等，这些学院强调充分利用大学丰富的科技传统开展教学与科研。学校还新建了自己的医学院。上海交通大学的副校长强调说，学校的使命源自受到广泛共识的基本原则，包括杜绝平庸、支持改革和创新、高度清楚所肩负的培养高质量学生的使命感，这个使命还在不断讨论之中。

华东师范大学是一所相对年轻很多的学校，在 1949 年新中国成立 2 年之后创建。该校以法国或苏联师范（教师培训）大学模式为蓝本。该校被认为是国内在教育、人文和自然科学领域最好的两所师范大学之一。华东师范大学的校长认为，尽管中国历史上在文明和文化领域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成就，但科学和技术逐渐在有关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所有讨论中占据主导地位。他指出，国家政策号召入选“985 工程”的综合性大学把“985 工程”经费的 15% 用于人文专业，诸如上海交通大学这样的理工类大学需要把“985 工程”

经费的 5% 用于人文领域。因为这些大学缺少浓厚的人文传统，它们往往利用这些经费从华东师范大学等高校招聘高级学者，因此给人文学科较强的非“985 工程”大学带来双重威胁。

结论

仅通过这几所大学作为样本就得出结论是不明智的，但有证据表明，20 世纪 50 年代在苏联模式影响下建立的优先发展科学和技术的大学在新文化行动方面处于领先地位。有趣的是，“985 工程”一期建设的 9 所大学中有 6 所属于这一类，而另外 3 所属于传统的综合性大学。

作者注：“985 工程”一期 9 所大学包括 3 所传统的综合性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南京大学；6 所理工类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

译者注：本文译自 Number 39, Spring 2005,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新加坡环球校园计划中的问题

Cate Gribble, Grant McBurnie

Cate Gribble: 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 电子邮箱: cate.gribble@rmit.edu.au

Grant McBurnie: 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 电子邮箱: grant.mcburnie@rmit.edu.au

新加坡环球校园计划旨在到 2015 年时吸引 15 万外国学生到新加坡留学, 但这一战略最近受到了沉重一击, 即新南威尔士大学宣布将关闭其刚运营了一个学期的新加坡分校。在与新加坡经济发展局签订的协议中, 新南威尔士大学新加坡分校的目标是到 2020 年, 在预计的 15,000 名在校生中, 外国留学生的比例达到 70%。新南威尔士大学指出, 低迷的入学率 (导致数百万的亏损) 以及预计将进一步出现的经济损失是关闭新加坡校区的原因。据新南威尔士大学校长称, 学校已在该项目中投资 1,750 万澳元 (合计 1,430 万美元), 可能还需要几百万的资金用于遣散超额员工和撤离。新加坡政府也为这一项目投入了大量的资源, 但具体数字未公开。这次关闭分校的事件距离 2006 年 6 月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宣布将在一年内关闭其在新加坡的生物化学研究所 (建于 1998 年) 的事件不到一年。新加坡科学技术研究局停止对该项目的大量资金投入, 因为该实验室的许多重要的绩效指标都未完成, 其中包括未能实现招收博士生和吸引国际领先水平的医学研究人员移民新加坡的目标。

成为教育中心的远大理想

今年是新加坡确立 10 年内吸引 10 所世界一流高校在新加坡建立分校目标的第十年。新加坡政府已经超额完成了预期的目标: 目前已有来自中国、美国、法国、印度、德国和荷兰的 15 所世界一流大学在新加坡开设分校。这些精英大学大部分都提供定位合理的专业, 被期望主要招收国际学生。与此相反, 新加坡公立大学国际学生的比例不能超过 20%。此外, 140 个新加坡本国的私立教育机构与外国高校合作办学, 以满足那些

未能进入新加坡著名公立大学或外国顶尖大学学习的新加坡本国学生和外国学生的需求。根据官方统计, 2004 年接受跨国教育的学生占新加坡高等教育学生总数的 36% (学生人数超过 8 万)。

2006 年, 有 8 万留学生在新加坡学习, 比前一年增加了 11%。新加坡显然已成为受亚洲学生欢迎的留学目的地, 小部分来自欧洲、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学生也选择留学新加坡。许多留学生认为通过新加坡可以很便利地了解亚洲, 因为新加坡既提供了在著名大学接受西方教育的机会, 也提供了熟悉汉语和华人商业实践的机会。

目标是否现实

环球校园计划的提出出于发展经济和招募技术移民的考虑。后者是新加坡政府在面对低出生率以及在只有人力资源而自然资源匮乏的国家建立知识经济的需要时, 所做出的深思熟虑的决定。为使新加坡成为一个留学目的地, 经济发展局实施了环球校园计划, 新加坡旅游局负责市场宣传和招生。其最终目标是将新加坡建成一个教育中心, 吸引有可能留在新加坡工作 (成为雇员或企业家) 的外国人才到新加坡学习, 从而带来外汇收入, 帮助新加坡吸引更多的世界一流研发机构和跨国公司。

尽管已取得了一些成绩, 但新加坡要实现成为全球教育中心的目標还需要解决若干重要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新加坡政府和新加坡的外国教育应确立现实的目标。从历史上来看, 大学和政府往往过高估计未来的学生规模而过低估计成本。最近新南威尔士大学和霍普金斯大学的行动就是相关的例证。其中的一个教训是, 它们应该预见到一旦大学

离开其母体（所在国家），其吸引力会降低。因此，以适合有关各方的方式调整目标是个挑战。除直接影响学生外，关闭分校将破坏公众对跨国教育、跨国教育机构和东道国的信心。

对外国教育机构的监管

第二个问题是需要建立一个保障外国教育机构质量的透明体系。到目前为止，新加坡教育部对外国教育机构基本上采取不干涉的态度，而主要关注本国公立大学的运作。但环球校园计划需要政府采取监管措施。向公众公布欺诈机构提供的课程质量低或者造成他们学费损失的留学生有可能破坏新加坡的声誉，不利于实现其建成全球教育中心的目标。目前，新加坡消费者协会对私立教育机构施行了注册制，当它们万一运营失败之后，通过诸如学费政策、学生救济和保险等手段保护消费者的权益。产品和创新局还建立了新加坡私立教育机构的质量等级，以解决私立教育机构的管理和运营结构问题。但上述两项措施均没有解决学术标准问题。

教育部对学术质量保证所采取的自由放任政策不久将会发生改变。主管国家贸易和工业的大臣最近建议教育部探索引进一项认可制度的可行性，以确保私立学校满足一定的标准，如财政稳定、学生保障和学术严肃。对新加坡私立教育机构的进一步监管可能是实施认证制度认可那些高水平的私立教育机构，为学生择校提供指南，同时给不合格的教育机构增加压力。

对外国人才的需求

另一个新出现的问题与新加坡对外国人才的需求有关。公立大学为顶尖的外国留学生提供了丰厚的奖学金以留住他们在新加坡生活和工作若干年。正如一所公立大学的发言人所讲“我们不要你的钱，我们要你的才能。”娴熟工人和专业人员的自由移民政策便于外国人才（包括在许多外国机构求学的留学生）留在新加坡。新闻媒体暗示，政府对外国人才的需求正导致本国人民对留学生的怨恨日益增加，原因在于这一政策正在提高入学标准，减少了新加坡本地学生进入公立大学就读的机会（实际入学者仅限于前25%的高中毕业生），同时也导致就业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

1997年，新加坡政府开始实施“新加坡21世纪工程”（Singapore 21 Project），鼓励生活在新加坡的人们积极参与国家未来的建设。该工程称，许多新加坡人民都能认识到国家层面对外国人才的需求，但在个人层面却感到面临威胁。尽管对外国人才的需求看起来是出于对新加坡国情考虑而提出的正确且有远见的措施，但它未能缓解新加坡当地学生及其父母对不能就读于公立大学的担心。关注新加坡政府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以及新南威尔士大学高调宣布关闭其新加坡校区将对环球校园计划带来怎样的影响，将非常有意思。

译者注：本文译自 Number 48, Summer 2007,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牛津大学全新的管理理念

David L. Kirp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古德曼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电子邮箱: kirp@uclink.berkeley.edu

自去年春天宣布新西兰人约翰·胡德(John Hood)将出任牛津大学校长(学术等级中的最高职位)以来,已召开了许多次高层圆桌会议。虽然这是牛津大学900年来第一次在英国之外寻找合适的领导者,但是这一任命如此引人注目的原因却在于胡德的职业生涯。

从建校以来,人文学科一直在牛津大学具有优势,校长一直出身于这些领域。相反,在担任奥克兰大学(Auckland University)为期四年的校长之前,胡德是一位在工业领域颇有影响的工程师和商人。这样的任命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哈佛大学都会被认为是冒险的举动,更不要说牛津大学了。在劳拉·泰森(Laura Tyson,伯克利分校商学院前院长)被选聘为伦敦商学院院长,艾莉森·理查德(Alison Richard,耶鲁大学前教务长)被聘选为剑桥大学校长之后,牛津大学的这一任命体现了英国和国际上将更多的管理和企业方法引入高等教育的趋势。

这些发展趋势的源头在长久以来都在追求效率的美国。1908年,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派遣精通“科学管理”新原则的商人莫里斯·库克(Morris Cook)去研究美国的大学。库克对他所看到的现象非常惊讶,“商业领域获得广泛认可的管理原则基本都能适用于大学的管理,但却没有一项原则被大学普遍应用”。库克认为,学术自治是不负责任的许可证。主要反对声音也敲响了熟悉的警钟。1917年托尔斯坦·凡勃仑(Thorstein Veblen)批评把大学转变为“知识的公司”(corporation of learning)的趋势,即“按照公司处理事务的方式将学校事务先后排序……商业原则入侵大学,削弱和阻碍了对学习的追求,因此毁灭了大学存在的目的。”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公共财政经费

开始下降为大学预算的一部分,美国高等教育一直贯彻增加经费筹措、降低成本的措施。正如我新著《莎士比亚、爱因斯坦和底线:高等教育营销》(Shakespeare, Einstein, and the Bottom Line: The Marketing of Higher Education)中所言,库克的精神继承者——受过商业实践训练的新一代大学管理者认为,想象大学可以在有组织的混乱状态中维持下去是愚昧的。一旦掌权,他们将缩减大学内部的经费开支,同时从外部私有部门筹集资金。“加州大学的成功之路(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means business)”已成为世界最受羡慕的公立高等教育体系的代名词。市场价值观的盛行还加大了入学机会的差距:与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相比,贫困家庭的孩子上大学的机会更少,且很少能进入精英学校。

来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经验教训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企业型大学”(enterprise universities)都采用了以市场为基础、以管理为导向的管理方法,欧洲国家的几所“创业型大学”也采用了这些方法。造成这些变化的动机是大家熟知的:高等教育的迅速扩张经常以提高经济产出的名义获得合法性;政府经费支持的比例降低,因此需要从其他渠道筹集经费;对最优秀的教师和学生“流失”到美国的担心。在牛津大学,由这些现象所引起的适度变革已经出现一段时间了。但是根据胡德在奥克兰大学的做法,他将加速这一进程。文化冲突似乎在所难免。

尽管奥克兰大学自认为是新西兰最好的大学,但在胡德担任校长以前,它只是一所传统的教学型大学,而不是一所具有国际声誉的研究型大学。胡德将改变学校的这一境

地作为自己的使命。为了在公共经费减少的时代增加经费来源，他把学费提高到了政府允许的最高限额（该校对政府设定学费最高限额的必要性进行了激烈争论），还第一次恳求校友捐赠。在充满激烈竞争的科研环境中，由于缺乏学术产出，许多教师（包括全职教授）被解聘。胡德鼓励学院负责人招聘具有全球威望的教授，以前仅限于一小部分资深教师（英国的传统）的教授职位向所有教师开放。他还鼓励教授与政府和产业界进行合作，为那些从教学和学院事务中成功解脱出来的教授提供雇用兼职人员的经费。学院经费预算越来越依赖于在校生人数，因而学院通过吸引更多的学生扩大规模。奥克兰大学选择加入了21世纪大学联盟（Universitas 21），这是一个在全球开展远程教育以获得经费的国际大学联合组织，从在全球招收工商管理专业的学生开始。在这一创业过程中，奥克兰大学并没有遗忘其社会责任，学校把就读于工科等领域的毛利族学生的通过率增加了一倍，达到80%。

胡德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尽管他的一些创新举措受到了争议，如增加学费、迫使教师筹集经费和以公司的方式管理学校。不论何人，如果在争取政府经费时批评同事的能力的话，将会被开除，当他宣布这一制度时，许多教授怨声载道。胡德毫不后悔地认为，他对学术自由的“坚定支持”不适用于那些“任意或无理由贬低同事的人”。

从长满常春藤的学校转变为常春藤联盟中的一员

牛津大学是不能容忍胡德的做法的，贬低与赞扬同时存在。但胡德聪颖过人，“新牛津大学”可能已经做好听命的准备。在过去的五年里，牛津大学新建了一个商学院和“商业与科学园”。著名教授被丰厚的工资所吸引，经常横渡大西洋移居他国的事实使人们意识到，牛津大学再也不能固守传统了。正如前经济学教授约翰·凯（John Kay）在其著作《市场的真相》（*The Truth about Markets*）中所警告的，牛津大学面临着“逐渐沦落到平庸”的危险。学术排名下滑严重，政府监察人员将

牛津大学的历史研究排在牛津布鲁克斯大学（Oxford Brookes University）之后，后者是一个多科性技术学院。在牛津大学招收的学生中，仅15%来自贫困家庭（贫困家庭占人口总数的1/2），大约50%的学生来自私立高中（仅占英国受教育学生的3%），这一事实引起了全国对什么是“世袭诅咒”的大讨论。

英国高等教育所面临的市场压力非常明显。今年，政府将允许学费大幅度地上涨，同时将大学生资助中相当比例的奖学金转变为学生贷款。英国财政部一份新的报告鼓励大学与工业界建立更密切的联系，并加强与校友联络。胡德的前任，历史学家科林·卢卡斯（Colin Lucas）认为，“新牛津大学”必须提高技术创新、文化包容的能力，获得更多的国际声誉，所有这些都并非熟悉或容易完成的任务。

艰巨的问题不断出现。牛津大学能否从管理和创业观念中汲取最好的经验，而不屈从于对效率的过度强调呢？能否以差异化的薪水去延揽知名教授，就像最近所开始做的那样，而不破坏同事关系呢？是否能在加强研究生教育的同时不忽视本科生教育呢？能否从“长满常春藤的学校转变为常春藤联盟中的一员”？《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对牛津大学能否避免成为美国大学的一个病态版本表示好奇。因为牛津大学就是牛津大学，所以这些问题都非常重要。

牛津大学商学院院长安东尼·霍普伍德（Anthony Hopwood）认为，“确实存在走向未来的意愿”。大学与学院之间的竞争无疑将会很激烈，一些学院比学校还富有，并且非常戒备地保护着各自的特权。由于通常情况下批准大学校长遴选的教师大会在任命胡德之前没有召开过会议，所以胡德的任命不符合学术程序。

然而，这一非传统的选择可能会是振奋人心的。胡德作为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现代大学管理者、一个重视学术价值却对学术伪善没有耐心、对卓越和平等充满热情的局外人，也许是最合适的人选。

译者注：本文译自 Number 35, Spring 2004,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简介

为了加快综合性、研究型、国际化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进程，上海交通大学于 2007 年 12 月 26 日在原高等教育研究所的基础上，成立了学校直属的"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简称高教院)。高教院下设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研究生教育研究中心、科学与技术政策研究中心以及《国际高等教育》编辑部。

高教院坚持以实证和定量研究为特色，以"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为标志，在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已经具有良好的国际声誉；以教育部科技委《专家建议》为标志，在政府咨询方面已经产生广泛的国内影响。

以小规模、创新型、国际化的世界知名人才培养基地为目标，高教院致力于培养高等教育学、科学与技术管理等领域的专业人才。在校硕士生、博士生和在站博士后总人数的规划目标为 80 名，且大部分博士生有出国访学经历，留学生比例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以小规模、高水平、国际化的世界知名社会科学研究基地为目标，高教院致力于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学术研究团队，有选择地追求卓越，在世界一流大学研究、研究生教育研究、定量科学与技术政策研究等领域打造国际学术品牌。



The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GSE),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was established in 2007. GSE aspires to the highest standards of scholarly and professional practice, emphasizes quantitative research and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and focuses on applied research, policy studies and consultation.

GSE builds on the tradition of excellence of the former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which was established in 1985. The "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 (ARWU)", which was first published in 2003 and updated annually, has gained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Consultation reports on strategies for building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and science policies, which are provided to Chinese governments on a regular basis, have attracted national attention.

GSE focuses on higher education and specifically on research universities in the context of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It has three research groups, namely the Center for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Graduate Education, and the Center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The centers will have world-class research teams, leading international partners, and a highly internationalized student body.

GSE will uphold the best academic values—a commitment to academic freedom and original inquiry, service to the academic community in China and beyond, and provide the best possible education to graduate students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science policy.

Statement for SJTU for the Chinese Version of IHE

The publ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is a significant initiative in internationalization. The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at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and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at Boston College are partners in providing global higher education information to a Chinese audience.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is dedicated to analyzing key trends in higher education worldwide. We are delighted to be able to share our publication with the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community. Publication of IHE in Chinese is a sign of China's commitment to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We hope to be able to publish more analysis of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s in China for our international audience as a result our collaboration with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o that the information flow will be a two-way street.

We are especially delighted to launch this initiative with the new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at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GSE has internationalization as a key goal and is one of the few such institutions focused on higher education.

Philip G. Altbach, Director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Boston College
USA